炎黄春秋

2002 6 总第123期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中国历史上官妓及其它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2002/6(总第123期)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1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汪澍白
7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纪　敏
15　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冯建辉

英　杰　谱

20　"中国拓扑学派"的数学泰斗江泽涵……………………江春泽
25　铁书生周小舟……………………华　强

沉　思　录

28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沧桑十年》序……………………季羡林
——《沧桑十年》前言……………………马识途

亲　历　记

34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宋政厚

同　心　结

37　日军弹药车旁的遗书……………………刘大为　傅　克
39　中国第一位日语播音员原清志……………………孙建和

陨　星　篇

40　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穆　欣
46　解除囚禁后的余生——《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完)……………………徐庆全　赵　杰

文　荟　园

54　牟作云梦系五环旗……………………李玲修
62　巴金的爱情与婚姻……………………明　红
64　儒雅君子孙道临……………………宫洁民
65　蒋劲华的手撕"书法"……………………傅宁军

一　家　言

66　学风三昧……………………郭毅生

人　物　志

68　头等战犯、大法学家王世杰……………………傅国涌

资　料　库

58　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学通
70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孙代尧

古　镜　台

72　中国历史上官妓及其它……………………官伟勋
75　赤壁之战中的张昭……………………纪拥军
76　酷吏与酷刑……………………舒　展

九　州　景

80　宜昌小峰悬棺……………………李华章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郝爱存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电话: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 dragonsource. com
gb. dragonsource. com
www. qikan. 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 sina. 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 汪澍白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最突出的贡献,首先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大胆地打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功地进军井冈山,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来日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辟了新的途径。然后,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认真总结了工农武装斗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更深刻地批判了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想,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这样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更为现实的广阔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现代工业极为薄弱、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似的社会经济基础。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便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初步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良好开端。但为时不久,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行将开始时,他就急于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仿效苏联经验,将工作中心转向于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在形式上取得超高速的成功,实际上却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留下深重的隐患。本文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及其在实践中陷于夭折的历史过程与经验教训略加探讨。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确定了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开始大家并不清楚。苏共和中共的领导层中都有人认为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共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待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以后,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但1927年大革命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导致了革命的惨痛失败。

从192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一直为“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开始纠正。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也有人提倡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了澄清当时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吸取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1939年先后推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十分明确地回答了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1)革命转变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固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主义政治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为转向社会主义扫清道路。这对恶意宣传家有意混淆不同革命阶段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是有力的批驳;对曾经在中共党内几度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种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是一次认真

的清算。

(2)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大革命时夺取了领导权,就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革命势力反复进行“围剿”,并导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新民主主义论》对此所作的深刻揭露,既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宣扬资产阶级专政论的当头批判;对抗战初期在党内一度滋长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也是及时的警诫。再者,它还向全党指明了方向,要努力争取和掌握当前抗日救亡与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领导权。

(3)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泽东将民族资产阶段与大资产阶级认真加以区别。《新民主主义论》写道:“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 (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在革命时期,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建设的时期,也要坚持和发展这种统一战线。“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能否正确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走向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1944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补充说明:“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说,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社会,还不是很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当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开创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并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之后,才有条件逐步实现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到有了现代工业基础时,才可以说是进入了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5 年 4 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 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决心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所作的庄严宣示。

毛泽东还对《论联合政府》作了口头说明:“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又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从这些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了信心,而且还特别强调应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框架下,对发展民主主义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华民族出现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机,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挑起反共内战并妄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逐步实现《论联合政府》所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为此,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议”。蒋介石在协议的掩盖下发动了内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军就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并转入反攻阶段。1948 年在连续攻克一些大城市后,发现一些解放区在土改和工商政策上出现了某些“左”倾苗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同年 7 月 27 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审

稿的《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更具体地解释说：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新华社的《问答》及时克服了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所造成的危害。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后，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进行了前瞻性的讨论，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形成了《决议》，《决议》既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又指明了将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多种经济形态：现代性工业 80%以上为官僚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所拥有，经国家没收以后，便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现代性工业的 20%左右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 90%的比重，应通过土地改革充分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合作化的方向发展。《决议》对以上所述又作了这样的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反复探索、集思广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新民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始。但在一部分干部中，由于革命的胜利滋长了一种“左”的情绪。在 1950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说“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有人认为“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甚至提出了乘胜挤垮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及时克服诸如此类的“左”倾思想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阶层的关系，毛泽东在 6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重申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强调要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共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他还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然而，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土地改革的渐次完成，在国家机关和全国城乡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土改以后，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发家致富，对互助合作的态度并不很积极，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出现了涣散现象。

1951 年 4 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提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果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并提出要以增加公共积累和引导互助组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发展方向。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从事，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向刘少奇请示。7月3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这一段批语同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作的尖锐批评，立场观点完全一致。但是，随着时间与形势的推移，毛泽东的认识已发生很大变化。他看过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刘少奇的批示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不赞同刘少奇的批语。他的论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谈话过后，刘少奇立即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重新处理山西省委的报告，但是，他在思想上仍有矛盾。根本问题是，他并没有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从城市的情况来看，1951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机关内揭发出大量的浪费、贪污与官僚主义问题，尤以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最为令人震惊。为此，中共中央于当年12月1日作出决定，要求各级机关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通过运动，清理了一批腐败分子，对于树立廉洁纯朴的干部作风和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那时给贪污腐败分子戴上一顶资产阶级帽子，就显得有些勉强。刘青山、张子善的所作所为，其实同传统社会的贪官、赃官差不多，同《闯王进京》剧中的刘宗敏也有几分相像。这类人，与其说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还不如说是封建主义与农民意识的病毒发作。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并存，私人资本主义也得到适当发展。有少数私营工商业者，在与公家发生关系时，出现了某些行贿、偷税、漏税、诈骗、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中共中央在国家机关开展“三反”的同时，又在城市开展“五反”，认真清算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问题是，这场“五反”运动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斗争，因而难免出现打击面过宽、侵犯正当资本家的利益乃至敌视整个资产阶级的“左”的偏向。

在“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毛泽东修改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中有关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的提法，并专门写了批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随着对主要矛盾的认识的改变，毛泽东开始对原有的战略部署进行重新考虑。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又说，我国在10到15年内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这同刚解放时，毛、刘、周等中央领导人表示要经过15年，20年，甚至3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相比，显然是大大地加快了战略转变的步伐。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通过率领调查组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的方案。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提出的方案解决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途径，他感到实现战略转变的底气更足了。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次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他就严厉地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个秩序，明年就不“确立”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认为，以上三种“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在于：“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

建国初期，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出发来安排各项工作的。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并被会议采纳，写进了4月9日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第二条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的讲话所批判的虽不是刘少奇的原话，但却切中刘少奇以及党内外许多人认为现阶段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

1953年8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又在指示中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说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这就不但从理论上否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且连1949年至1952年在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过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一笔勾销了。

接下来，批语还严厉指责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志违反了党的决议：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本文第一节曾经概述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小生产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形成了《决议》第六节第五点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同时并存、各得其所的构想。但是《决议》第六节第六点又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了仿效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计划经

济建设，便断然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谁若是继续遵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方针政策，那就会被指责为违反二中全会决议和犯有右倾错误了。

《决议》的文本，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重温这一文件，发现其中确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前述第五节中的第五点与第六点就颇不协调。毛、刘视角不同，各执一端，自然难免产生意见分歧。今天我们回头来总结经验，固然要认真对待分析当年的历史文件，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两种理论与方针政策的实践效果。

开国头三年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但党和政府推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因而能够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且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新民主主义制度初步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但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远远没有发育到成熟的程度。为此，刘少奇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的。相对来说，毛泽东于此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并向刘少奇作出了尖锐批评，主要是套用了他并不十分稔熟的苏联模式，却完全背离了他与党中央长期以来精心建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毛的话却是不容违抗的向“左”转的号令。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等人坚持稳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为“小脚女人走路”，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加速发展的要求。同年10月，又召开扩大七届六中全会，将邓子恢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毛的报告和中央决议下达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便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狂潮。到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后来同他的秘书田家英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都说过，1949年全国解放时，并没有使他高兴，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他才真正感到高兴。这是他急切企求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情流露。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现代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农业生产还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的条件下所推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不过是对农民的土地资源与长期劳动积累的一次合伙平产。其实质就是1948年4月他所尖锐批评过的那种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论》是背道而驰的。从实践结果来看，它也不是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取得增产增收的效益，而恰恰是相反。“不想前，不想后，只想合作化前土改后。”这句在当年农村中相当流行的顺口溜表明，农民的思想感情与曾经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的毛泽东（瞿秋白语）的思想感情，已经南辕北辙了。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超高速完成，手工业的合作化与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于1956年在政权力量与群众运动的挤压下同时报捷。表面上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实际上却是以快刀腰斩了欣欣向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强行将有活力的多种经济成分纳入单一的公有制与计划轨道；它以行政组织指挥经济活动，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把整个社会引向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到1956年苏共20大思想“解冻”时，毛泽东又突发“引蛇出洞”的奇谋与“趁穷过渡”的异略，以致误导出最后20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在历尽“大跃进”至“文革”的20年磨难之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拨乱反正，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进而创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决策，它显然是对“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间断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难怪有人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半个世纪以来对革命与建设事业为害最烈的“左”倾顽症，从容不迫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办好。

（责任编辑　杜　晋）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 纪 敏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

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访问期间,谈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生命垂危之时,用一双颤抖的手,在《参考消息》上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了最后一次批示,当时就让我感动,至今仍然铭记在心。

我记得罗青长特地同我谈到,在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要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罗青长说:

"总理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经过清理,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按照中央批示精神,准备将这些战犯全部释放。

"在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病亡5人,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正如罗青长所讲,后经核心小组慎重研究,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十三局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反复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来的人讯问调查。会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这些地区被俘的国民党战犯，确实多已特赦释放、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是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以后俘获的。

在清查锦州等地是否还有在押国民党战犯过程中，以及在讨论审议哪些人应按起义投诚待遇时，确实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竟是少将级别。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

周恩来在病榻上研究蔡省三与蒋经国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于1975年3月19日上午，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及呼和浩特看守所，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特赦释放。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共十六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1975年3月17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上作了专题说明：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见报后，引起国内国际舆论一片赞誉。

各地获释人员通过认真学习、讨论，普遍称道：中共政策说话算数。但不少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担心回台湾受歧视或受陷害报复，不敢递交申请。惟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人与济南战管所的一人，提出回台申请，并被批准。申请回台湾的前国民党军官依次是：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

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

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

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

杨南邨，原国民党一五O师上校团长；

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

张铁石，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

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

以上人员除蔡省三外，其余均有亲人在台湾。那么，蔡省三为什么要申请回台湾呢？据蔡省三出境后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介绍：

中共的这条政策（注：指允许回台湾，并给路费）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我心里开始琢磨："去不去台？"内心深处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中国政府一旦将政策公布于世，一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如果报名回台，等于回应了中共的政策。

说到回去，心里又有一种隐隐的伤感。那就是对原妻曹云霞的思念。我与云霞感情甚笃。我俩在蒋经国先生的主持下结婚，搞宣传，历抗战，走过多少坎坷人生路。我俩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可是当我被俘判刑之后，即主动提出与她离婚。我希望她带两个女儿，为了生活，以后再嫁。但不管怎样，我心里却依然看待她是我的妻子。如果去台湾，与云霞、与女儿，今生恐难再见了。

从政治上，回台湾也不是件轻松事。我在南京任职就办理过此类事，凡从战场上释放回来的战俘，一律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监管。我们关押25年后回台，再进台湾监狱的可能都有。

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因为苏联还在对中国虎视眈眈，苏联的霸权仍然对中国构成极大威胁。我想促进国共联合反霸。

想到这里，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在北京，公安部史处长让我们登记名单时，我第一个报名。去台湾，就是冒险，就是牺牲，我也要尽己职责，向蒋先生进言。他听不听我不考虑，尽了言责，也算了却了心愿。

蔡省三等10人，1975年4月13日离开北京，乘飞机经广州、深圳而至香港。临行前，4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蔡省三等一行送别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杯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申请回台人员，听到童小鹏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蔡省三明白，他在台湾并无亲人，只有在大陆已离婚、还不知去向的原妻曹云霞及两个女儿。所以，当第二天，童小鹏等前去北京机场送行时，登机之前，蔡省三便笑着探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也申请去台湾可以吗？" 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就实讲，毛泽东决定全部释放在押被俘的国民党人员，其本意是为了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秘密接触，便于进一步进行双方间的平等协商和对话。而处在东南一隅的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则将中共方面的宽容和善意视为"统战阴谋"及对岛内进行"渗透"。据说当病中的蒋介石听到蔡省三等10人将要回台湾的消息，竟然惊叫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了。

另据已离职在香港休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的黄文放先生介绍：

"当年正是由于预计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对台湾社会的巨大冲击，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影响，中央特别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负责处理'十人回台'的有关事宜。直接的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专责小组由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组成，统战部牵头，小组领导人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工作人员包括统战部的焦奇、刘小平，调查部的杨荫东、耿文卿，公安部的胡治安。

在香港，也组织了专责小组，领导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黄直接领导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总经理方远谋、副总经理黎汝湛以及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全部接待工作。"

1975年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到达香港后，展开了海峡两岸"允许回台"与"拒绝接受"的斗争。当时，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派出超过100名记者到深圳罗

湖桥进行跟踪采访。第二天，全香港中英文报纸及广播、电视无不以大篇幅报道有关10人申请回台路经香港的新闻，有些报刊还屡屡发表社论、评论，普遍赞誉中共的“英明之举”。

然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却陷入了极大的政策矛盾之中。一方面，这10人原都是国民党军官，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释放，本人申请回台湾与亲人团聚，在情在理，本应核准入境。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被俘人员获对方宽大释放后，自己一方却拒绝接受，否则，定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让这10人回台，势必会在台湾社会引起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神话，并动摇和冲击岛内的军心、民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使台湾统治当局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

这样，台湾当局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台湾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立即接收这10人回台，以消除国际上的恶劣影响。大部分国民党政界人士，包括张群等人在内，都赞成这一主张。但台湾军方与特务、警务机关则极力反对让获释人员进入岛内。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台湾军警的士气得以维持，并使台湾社会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至于溃散。在激烈的政策争吵中，刚刚掌管政权的“实力人物”蒋经国实在没有更好的计策可以应付，也就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为其上策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致使申请去台湾的10人滞留于香港140多天。先是张铁石被台湾派来的“特别审查小组”里的一位姓钱的特务头目，诱骗搬进台湾特工人员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张铁石的路费全部被骗走，张在台湾的妻子、儿女因受特务恐吓不肯为其担保，台方又一次不予批准入境，张铁石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于1975年6月5日在富都酒店自缢身亡。之后，其余九人感到去台湾无望，在香港也不宜久留，于是，赵一雪、杨南邨和张海商经申请又返回了内地，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于9、10月间，分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在香港病故。这样，留居于香港的仅有蔡省三一人。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八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将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这一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对他的注意。

据童小鹏介绍，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变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区的大肠内有一肿瘤。1975年3月底，当蔡省三等10人离京赴港之前，周恩来正在做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后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最牵挂的是台湾问题。

人们还记得，为了促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曾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据介绍，当年7月16日，周恩来还接见了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此时在香港从事记者工作的曹聚仁。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信息转达台湾当局。国民党当局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实地考察”，毛泽东、周恩来让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1958年，针对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企图推进“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联蒋抵美”政策。8月23日，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了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周恩来并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金、马撤退，从而粉碎了美国妄图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蔡省三、曹云霞夫妇参观黄埔军校旧址

据童老介绍,1960年7月,章士钊再次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信息,临行前,7月17日晚9时30分在北戴河寓所与周恩来作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说,雷啸岑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童老解释,雷、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

据说到60年代末期,周恩来还请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张群分别写过信,传达周恩来促成两岸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当听说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后,周恩来曾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希望促进他们内部的团结。周恩来在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一时期,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转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因而促成国民党不断地派人到内地摸底、调研,或刺探大陆境内的高级情报。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的陈的遗嘱,一反常态,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据介绍,陈诚临终前,还曾通过有关渠道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一再表明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谈到从陈的遗嘱看,这是我们近四年对台通气、工作、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和有影响的。

但此刻,周恩来因病重躺在病榻上,他想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海峡两岸高层间的秘密接触,已感力不从心。况且,尽管他一次次地提出重点保护对象与名单,但那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仍在受着“四人帮”的排挤、煎熬。而在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又有谁愿意为台湾统治集团传话呢?深受器重的章士钊是一个例外。1973年章士钊患病住北京医院,章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毛泽东将章的信批转给周恩来去办。据童老介绍,周恩来对此事事先不知道,他找到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了解到章还有一位夫人在香港,认为应让他去,但章是人大常委,因患病得坐专机飞港,就决定由外交部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飞香港。经报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又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把拟用专机送他去香港的事告章时,章很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周恩来对章说,到香港要好好休息,我们的对台政策不变。章还可以在香港做做对台工作。章到香港之后三个月就病故了,周恩来只好安排飞机将章的骨灰运回北京。据童老回忆,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的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据说,原文为“遥望南天”,毛泽东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

不恰当，便改为“南云”），诸希珍重。”章士钊在信中还谈道：“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毛泽东很欣赏和称赞章士钊的这些话，所以，当谈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时，毛泽东便指出，如《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毛泽东说，可惜，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此刻，周恩来躺在病榻上，他想到与其对峙多年的蒋介石刚刚病逝，与自己深交多年的老友章士钊先生也已故去。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不过，蔡省三申请去台湾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却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75年冬，经蔡省三向内地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蔡省三的前妻曹云霞在办理完与二婚丈夫的离婚手续和与蔡省三复婚手续之后，来到了香港。曹云霞利用从内地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得的中医偏方，开了一家中医诊所，蔡本人则为谋生除了写单篇文章，还接受香港《新报》聘请，特辟《蔡省三专栏》，每天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短文，评述当前时事，因而开创了香港报业史的先例。《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据蔡先生后来介绍，他为《专栏》撰稿20年，略计写了4000多篇文章，大约有不下500万字。在此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曹云霞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一批专著：《蒋经国与苏联》（蔡省三著）、《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辛明著）、《赣南忆旧录》（曹云霞著）、《蒋经国系史话》（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等等。

以上所列，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一篇题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新华社《参考消息》1975年9月1日至4日连载四期，周恩来必读无疑。因为周恩来临终前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病榻旁放着的1975年9月4日《参考消息》上。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这篇专访文字太长，现略摘一、二：

前言：蔡先生原名希曾，号省三，江西人。现年56岁，原是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系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及重庆时期的助手。现时在台湾的要员王升、李焕、楚崧秋、易劲秋等人，都是蔡先生的朋友和学生。

访问的时间是（1975年）7月30日下午3时至6时，地点在蔡先生下榻的帝国酒店，访问者有本刊编辑部三人。以下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谈话实录。

……

问：这次台湾当局，对你们的回台要求，设置了许多障碍，至今还不让你们去。据一些报纸透露，怀疑你们是“匪谍”或“统战工具”；第二是怕你们去了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跟着来，您对这两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我想台湾当局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是最后一批，290多个在押战犯，包括50多

蔡省三（右）在北京会见罗青长

名职业特务,全部释放了。这最后一批中提出回台湾的,就是我们10个人。所谓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那是全无根据的估计。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这次被特赦的200多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当年是投降的,我们都是被俘、被捕的,可以说是为国民党尽了最后的力量。而这次被特赦,和以前几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以前被特赦的战犯要经中共当局鉴定,起码他们认为满意的才释放,但是,这次是不问表现如何,全部释放。台湾当局应该正视这个事实。

问: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您谈谈您这次要求回台湾的动机呢?您同其他九个人不同,您是没有亲属在台湾的。

答:这次共产党针对一部分特赦人员的想法,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对于这一个政策,我表示欣赏,这是我原来也想像不到的,于是决定试试。在台湾,我有很多朋友,我希望能够去同老朋友叙叙旧……

问:据说台湾方面曾经要你们以难民的身份登记,要你们发表反共声明,是有这些事吗?您个人的态度如何?

答:我的原则是"一去,三不去",所谓"一去",就是为访友而去,朋友要见我,我就去,不要见我还去干嘛?"三不去"是: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要找保我不去;写信表心迹我不去。……拿我来说,1949年以前的情形,最能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只要蒋先生点一下头,我就可以去了,何须担保呢?如果他对我这20多年来不信任,那么还有谁敢担保呢?我坚持不填保单。

问:您同蒋经国先生同事,是赣南开始的吗?您是不是在他到台湾以前的三个阶段都同他在一起的?

答:不错。但主要是赣南时期和重庆干校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同他最接近。1938年,我在武汉珞珈山的中央训练团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由中央团部分派到江西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国民党派他担任三青团江西支部筹备主任,他分派我担任宣传大队长。从这时候开始,我便和蒋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彼此都年轻,成为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以后我们还办了《青年日报》,蒋先生任社长,我是总编辑。

问:有些人说,蒋先生从苏联回来,就开始反共,原因是什么?他在赣南时期是不是也反苏呢?

答:这一点我比较清楚,在赣南时期他还不是这样。

问:王升、李焕(注:时任台湾军方要职,均为蒋经国心腹)那时候也在赣南吗?

答:王升在赣南,他是我们在江西办的江西青干班第一期的学生。我的妻子曹云霞就是王升同期同学。李焕当时还不见其人,他是中央干校学生。

访谈结尾,蔡省三还以题《寄语青年时期的好友蒋经国先生》四句七言诗作结:

月明清夜深思量,通今达变除旧章。
安得青史着一笔,终是华胄好儿郎。

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托托托"

据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自1972年5月,在为周恩来作常规体格检查时,即发现并确诊他患膀胱癌。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他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

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早晨,周恩来的体温38.7℃,躺在病床上,吊着输液瓶子。病痛中的周恩来,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调查部部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按规定,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等人的拒绝。稍后,邓小平听到消息急切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值班人员按照邓小平的吩咐派车接来了罗青长。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又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得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方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周恩来一再嘱咐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医生闻讯急忙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知道总理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当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面对着罗青长,很歉意地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

息十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报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九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病重中的周恩来用颤抖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了一段文字：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注：指《参考消息》自9月1日至4日连载之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罗青长见总理又再度昏厥过去，未等向周恩来告辞，便悄然痛苦地离开了医院。1997年5月中旬，当我访问罗青长同志，罗老再度谈起这件事时，眼含泪珠地说：“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为了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费尽了后半生的心血。可以说，他为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尽了心和尽了力了!”

为了弄清当年获释人员申请转港去台经过，1997年夏天，我还同已在香港定居的蔡省三先生取得了联系。当在电话中谈起周恩来临终前写的嘱托，蔡先生就异常激动；同时，他还向我简述了于90年代初，他终于获准进入台湾，在台北见到国民党某高官(蒋经国的亲骨肉)时的一些情况。对于周恩来嘱托事，蔡先生说他是后来知道的。他寄来的文稿是这样记述的：

1992年，香港放映大陆电影《周恩来》，友人嘱我一定去看，说总理对我的文章有过批示。当时夫人曹云霞病脚，却也坚持与我一道去看，但影片未见有关我文章的批示。

1994年国庆，我和曹夫人作为特邀贵宾赴京参加庆典，见到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我把梗于心中的疑团摊开来。罗青长很热心，在中央统战部宴请我夫妇时，调来中央有关档案，我才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对我文章的批示。

原来是1975年，香港《七十年代》刊发《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这篇专访文章，国内《参考消息》连续四天全文转载。当时，病重住院的周恩来看了连载，用颤抖的双手，在《参考消息》我的文章旁写下批示。

周总理的批示使我震动，“托托托”几个字更是触目惊心。当年我的这篇文章遭到一些人的大肆攻击。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对台关系？这关系着祖国的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

我凭着对经国先生的了解与理解，在文中谈到，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2、不会投降大陆；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参考消息》连续四天全文转载，可见它的重要性。这或许也是解放以后，国内第一次公开报道对蒋经国的正面评价。

周总理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努力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务实思想，以及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让我们敬佩不已。

回港后，我写了《周总理与两岸关系》专栏文章。我写道：七五年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当道之际，周总理有此独到的政治远见和务实要求，殊为难得。观乎当前两岸关系，应加深彼此的了解，促进互谅互信，促进交流与和平统一，乃是共同的迫切课题。故此，周总理有关两岸的批示，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1998年3月5日，是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在全国播放，其中第8集《总理与两岸关系》的最后部分说到：1975年9月4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的后面，他一连写了几个“托”字。

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人民的好总理》图片展时，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陪我一道参观。走到《总理与两岸关系》这一栏目前，看到那张放大了的、周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我不禁泪流满面。我写了一首小诗：“周总理呀好典型，鞠躬尽瘁为人民，病危犹书托托托，垂范万古念斯人。”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

● 冯建辉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推动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热潮。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造成“国人莫不谈革命”的氛围。同时也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出现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形成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1917 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所聘教员中,有自由主义派胡适,也有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有旧派学者黄侃,也有新派作家鲁迅(兼职)、周作人;有青年学者梁漱溟,也有“历史复杂”、且有污点、曾经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刘师培……如此等等,曾引起社会上的种种非议。蔡元培发表《致 <公言报> 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答辩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正是因为贯彻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京大学这所死气沉沉的官宦学校(学生被尊为“老爷”,监督和教员被称为“中堂”、“大人”),成为聚拢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各种思想彼此交汇、互相碰撞的学术重镇,成为五四时代“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

“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原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众说纷纭的舆论,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自由与秩序》等多篇文章,从人类生存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教

训，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其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世界的多样性，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李大钊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

五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五种影响后世的学说流派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中，有五种学说流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更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主义”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子们想到，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呢?有人提出，中国最缺科学，应办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0月，留美学生又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该社迁回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多方面，并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成员发展到600多人。

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系统地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隽，于1920年第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

“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二是一些极端的“革命者”；三是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应该怎样评价“科学救国”主义呢？我认为四个方面值得肯定：其一，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下，大量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其二，宣传了科学思想和爱国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对工业生产、科技事业、科技人才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社会大变革年代，人总是要衣、食、住、行，生产是不能停止的。其四，尽管“科学救国”主义有缺陷，但作为一个口号，曾成为几代知识分子，在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矢志努力，报效祖国的精神支柱。

2.从国粹主义到新儒家哲学

正如陈独秀所说，国粹主义分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从人也”；“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个人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但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的了解，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深感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问题。并且大声疾呼：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

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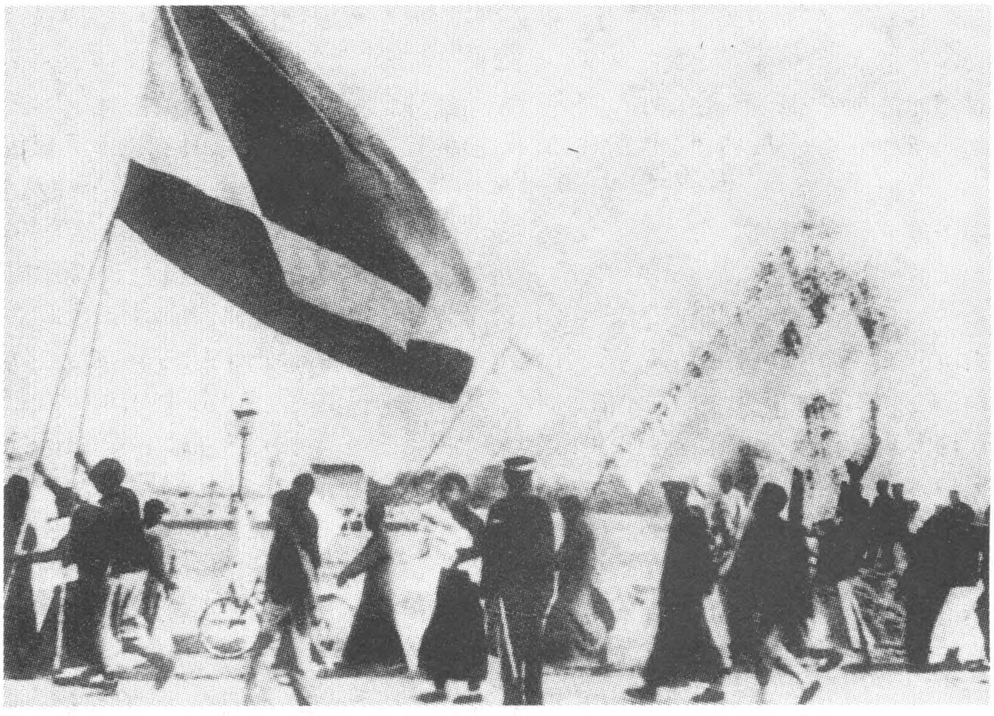
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李大钊在《今与古》中，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人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使得有些人在批评国粹主义时，陷入否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倾向于旧学，又不是旧派中的成员。他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新儒学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以科学见长；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以玄学见长；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以宗教见长。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很大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中国文化提倡和谐，比西洋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新儒家哲学的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然而，新儒学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于美国，20 世纪初到 30 年代进入鼎盛时期。1919 年 7 月，胡适发表《实验主义》长文，把实验主义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胡适讲的实验主义大体上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真理观，鼓吹"有用的就是真理"。二是发展观，胡适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他还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三是方法论，胡适主张研究问题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先找出问题；再提出"假设的解决方法"；进一步分析哪种方法适用；最后，用实验验证解决问题是否真实可靠。

1919 年 7 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一场大的争论。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推销改良主义，然而也确实抓住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弱点。李大钊等人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据理以争，指出胡适的实用主义错误所在，另一方面坦然承认胡适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胡适是个不甘



1919 年 5 月 4 日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寂寞的人,1922 年 5 月,联合十几位教授、名流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组织“好人政府”,又引起许多人参与争论。

纵观胡适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行,可以说,他既不是一无是处的罪人,也不是身泛灵光的圣者,而是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辗转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颇显尴尬的学者。他口称不谈政治,却又不甘寂寞,对政治难舍难割,跃跃欲试;他涉入政治,又对中国的政治(包括国情、民情、官情)并不在行。他被尊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然而他的“实验”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或梦境中。胡适身上的这些矛盾,在近代自由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胡适毕竟是个有大贡献的学者,他的思想遗产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4.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公例”学说

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会员。1912 年 5 月,由刘师复、莫纪彭等于广州,创立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 50 个,宣传刊物与书籍达 70 多种,遍及全国 14 个省市以及南洋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流行,除有小生产者与自然经济的广泛社会基础外,还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着直接关系。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也是喜欢追求新潮,刚刚接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的思想,而一时又缺乏深刻的理解;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却又难于摆脱旧的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在心理以及“无为而治”的理想追求,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迹。这些传统影响容易在无政府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除一般的主张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等,还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们在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仅有“互竞公例”不行,还要有“互助公例”。他们一方面看到“竞争,则优胜劣败。不竞争,则优败劣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胜者存,败者灭,则只有优者之进化,而无劣者之进化”的“弱肉强食”。他们主张:“互助与竞争并重”,“相害者,竞争;不相害者,互助”,“同则互助,异则竞争。同而不互助,则优劣俱败;异而不竞争,则优败劣胜。”(《无政府主义说》)现代学者对生物链的研究表明,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当弱者被吃得濒临灭绝时,强者无食可进了,必然也要濒临灭绝。人类比动物高明,人有思想和智慧,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能够自觉地调试某些关系,不致完全陷入盲目性。人类社会,既需要“竞争”,也需要“互助”。把“竞争”绝对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平衡,甚至陷入绝境,胜者本身也无法生存。这一思想,对于当今世界,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5.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迟迟为中国人所知晓,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只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根本在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其直接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中国则长期为封建专制思想所禁锢,再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落后,处处为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笼罩,这就使得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它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正如列宁在评论俄国状况时所说:“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

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这就使得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方合理的意见。结果,“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明确主张当时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不同意“现在中国就实行社会主义”,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就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短短几年内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的认识深入一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约有300—400个,且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创办刊物不下400多种。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来源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六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进行思想启蒙以求社会改造的历程中,碰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发动群众?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的舆论冲击,自己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认识,实际生活中又缺乏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和忏悔情绪。有的鼓吹起“教育无用论”,这种说法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把是否会干农家活儿作为衡量社会上一切人有用与无用的唯一标准,除了干农家活儿,一切知识都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灭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搞平均主义,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

五四时期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贬低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自身怀有的困惑情绪、忏悔情绪和自责心理,作为潜流,在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家,使这一潜流变为“洪流”,且几度泛滥成灾。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大整知识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许多知识分子都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愿地接受种种“考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一个特点。他们并不软弱和愚昧,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所致。

(责任编辑　洛　松)

"中国拓扑学派"的数学泰斗江泽涵

● 江春泽

2002年10月6日，是数学界公认的我国近代数学泰斗江泽涵诞辰100周年。他诞生在安徽旌德县江村，这座古老的村庄位于皖南山区的黄山南麓，南北朝文学家江淹的后世子孙居于此地已有1300百多年。江村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历史上却有"小杭州"之美称。它不仅景色秀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100多年前就有江村书屋，抗日战争期间，又建了一所藏书万册的江村图书馆。小小山村也因此而名流辈出，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下出过进士、举人等百余人，民国初10年间又有博士、学士17人。江泽涵，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与先驱者之一，给20世纪的江村又增添了值得自豪的骄傲。

值此纪念江泽涵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夫人蒋守方教授已于1994年双双地永远离开了我们。回忆与这对老人之间的乡情、亲情，往事历历如昨。老人辞世后，每当我再走过北大燕南园宿舍门前，禁不住总要在两位老人故居——燕南园51号的门前留步沉思，心里充满了凄楚和惆怅。

江泽涵是我的族兄，或称远房堂兄，我们同是江村人。按宗族排的辈分，我们同是"泽"字辈。我之所以未取名"江泽春"而叫江春泽，是因为我的祖父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有意把自己的后代的辈分移到姓名的第三个字，以示反封建的意思。

江泽涵的祖辈与我的祖辈虽然相隔较远，但因为同族又是同村，世代都有交往，但我本人与江泽涵夫妇及其在北京的家人的交往却是在1973年以后。在"文革"动乱后期，我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了，教师都被分配到北京其它高校，我随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转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办公地址设在三院，与泽涵兄家只几步之距。很自然地，我就经常去他家串门，陪他们谈天说地。每一次，我们都谈得很亲切，他们也欢迎我常去串门。从1973年到1994年这整整20年的亲密交往，给我留下了永恒的不可磨灭的深情回忆。

我从小就知道江泽涵是北京大学一位鼎鼎大名的数学教授，却无缘见面，但他们的堂姐江冬秀我却在孩童时就见过。关于江冬秀与胡适"土洋结合"的婚配佳话，在我们家乡几乎妇孺皆知。1945年8月，艰苦的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江冬秀回过一次江村，她还来我家拜望我的祖父和伯父。当时她与我祖父、伯父交谈些什么，我不知道，似乎听她称赞我伯父的中学办得不错。

真是弹指一挥间。自那以后，已28年过去了，我有幸能在北京大学登门拜访久已仰慕的数学大师泽涵兄。第一次见面，我就不感到陌生，因为他和他的胞姐妹长得很相似，泽涵兄为人谦恭和善，性格沉静、言语不多，一眼看去，就是一位思想深邃、刻苦勤奋的科学家。他的夫人蒋大姐更是待人和气，彬彬有礼。泽涵兄听力不好，蒋大姐常常为双方交谈作转述。蒋大姐本人也是数学教授，是泽涵兄的有力助手，晚年他们还合作翻译过一些科学巨著。我与泽涵兄交往多了，与他的家人都处得很熟。尤其是和他的三个儿子丕桓、丕权、丕栋有如同志关系，相互间都直呼其名，后来，在工作中我们还多次打过交道。

泽涵兄离别故乡很久了，但他生在江村，长

在江村，在江村接受了启蒙教育，17岁（1919年）时才随堂姐夫胡适来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又携全家回江村。当年，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泽涵兄赴长沙就任后回江村接夫人与次子丕权。1938年1月，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泽涵兄又于当年8月再次返江村接长子丕桓与三子丕栋去昆明。他这次重返江村时，曾在村里的安徽宁属六县联立中学（简称联中）发表过演讲。联中的校长就是我的伯父江康世。当年，宣城沦陷，在祖父江辛的支持下，伯父将校址由宣城迁往原籍江村。这所拥有千余名学生的完全中学，给江村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和全民抗日的呐喊，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馨香。抗战八年中，坐落在江村的联中造就了八千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当时，沿江、沿海十多个省市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和海外爱国侨胞都有人来江村求学，不少名师也汇集于此。江泽涵来讲演过，茅以升也来讲过学。所以，对于我的祖父和父辈，泽涵兄是熟悉的。他和蒋大姐能忆起在江村岁月的许多往事，尤其是泽涵兄对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难以忘情，他曾经眷恋地向我忆起在江村小学读书时，黎明即起，就着屋后金鳌峰反射过来的一抹曙光，坐在屋旁树下朗读国文的情景。

有一次，我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看到一条说胡适夫人江冬秀去世的消息，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们，我问起他们当年和江冬秀分手的情况。两位老人告诉我，1949年泽涵兄正在瑞士进修，此时北京和平解放了，是否要回北京成为他面临的重大抉择，他决心回到北京为祖国效力。当时胡适从美国给泽涵兄拍去一个电报，要他“到台湾去”（Go to Taiwan），但他回北京的决心已定，只在回国途经香港时，买了一张限期5天的往返机票，去台北探望冬秀和老师姜立夫以及北大的老同事。老同事们都劝他留下，还有人想把他扣留在台北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作。但是江冬秀却坚决支持他回北京，她顶撞想扣留泽涵的傅斯年说：“泽涵的工作在北大，泽涵的妻儿在北京。”姜立夫也支持他回北京（姜立夫本人随后也借口寻机回大陆了）。由于冬秀的明确态度，傅斯年只好放行。

与泽涵兄一家交往的20多年间，两位老人待我如同家人，不少点滴往事常常萦绕我的心头。

1978年，我被抽调参加全国宣传会议的筹备工作，办公地点在友谊宾馆内。一天，我在宾馆的院子里，突然遇见泽涵兄与多位科学家步出科学会堂，泽涵兄立即引我向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们介绍说：“这是我妹妹江春泽。”他这样不见外地向别人介绍我，使我感到很荣幸。

1984年夏季一天，世界最高数学奖——沃尔夫（WOLF）奖获得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回国办暑期数学研讨班，在北大演讲。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已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拟于当年赴美国访问研究。泽涵兄为了介绍我与陈省身教授认识，以便赴美后能得到陈教授的关照和指教，便通知我去北大听陈教授的演讲。陈教授的讲座听众大部分是数学家或数学界的新秀，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怎能听懂一位世界数学大师世界顶尖的高深数学讲座呢？我怀着几分胆怯的心情步入教室，不料大师的语言是那样的深入浅出，使我完全能听明白陈教授演讲的内容和他所做的工作的意义。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是终身成就最高奖。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聆听一位世界大科学家的讲演，真是大开了眼界。后来，我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时，和陈省身教授一家有过多次交往，得到他很多帮助。

陈教授和泽涵兄都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而且同是师从姜立夫老先生。泽涵兄比陈教授年长，是陈教授的学长。当陈省身和吴大任刚从南开毕业到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时，泽涵兄已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过一年研究助教之后回国，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兼课，陈省身和吴大任选读了泽涵兄讲授的“代数拓扑”课，这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次开设的拓扑学课程。

拓扑学是属于近代数学领域中的一门高深学科，早在20世纪20年代，泽涵兄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他的老师莫尔斯将拓扑方法用于分析，创建了临界点理论与大范围变分法，后世称之为MORSE理论。但莫尔斯本人当时只将此理论用于曲面上短程线的问题，直到70年代才将莫尔斯理论广泛应用于天体力学、经济学、电

路理论等等，使莫尔斯理论大大越出了拓扑学甚至数学范畴，推动了近代数学的发展。而第一个把莫尔斯理论运用到拓扑学以外的数学家就是江泽涵。

据吴文俊院士在为江泽涵90岁的纪念文集所写的代序中回忆，江泽涵早在3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即有这方面的发挥。70年代时，吴教授曾在美国一重要刊物上见到过一篇论文，内容正是论述泽涵兄早年写的这篇论文的，而且标题中竟赫然标以"江泽涵定理"的字样，可见国外同行对他的尊崇备至与评价之高。可惜江泽涵的这个贡献，几十年并未为国人所识，而泽涵兄为人谦和，从来也没有向人说起过他早年开拓性的工作。

江泽涵在拓扑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不动点类理论的发展。不动点类理论的研究是拓扑学中的重要课题，由于问题本身的困难以及所用方法的局限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慢，虽然40年代德国数学家在这方面有些开拓，可此后20余年又陷于停顿。直至60年代，江泽涵提出用复叠空间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才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的第一篇有关论文，于1963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年轻一代的拓扑学家，如姜伯驹、石根华等又不断在这方面探索并做出优异成绩，使江泽涵领导的这个集体，被国外同行称之为"中国拓扑学派"，有关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也多起来了。如果没有江泽涵深邃的洞察力与艰苦搏斗的精神，不动点类理论是难以想像会在国外相关领域中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和这样高的地位的。

泽涵兄在他一生为我国近代数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又以鞠躬尽瘁的精神、严正的学术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风范，在60年教学中，殷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3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师从莫尔斯时，莫尔斯的老师、国际闻名的勃克霍甫教授也在本系任教，他由此得到启发：应该鼓励学生胜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才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道德风范。他还看到曾在欧洲留学的美国前辈教授，如奥古斯德等人的学生们，如勃克霍甫、莫尔斯、莱夫谢茨等，后来都做出了扬名国际的成就，赶上了欧洲传统的数学强国。于是他立下决心，在留美归国后，要"团结同行工作者，迅速引进现代数学新理论，立志终生从事教学与研究，期以50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参见《数学泰斗世代宗师》江泽涵先生纪念文集）其后60多年间，他始终如一、坚忍不拔地实践着自己的决心。从1934年到1952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18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举荐了一个又一个杰出人才。他与同行真诚相处，从工作出发，严以律己，顾全大局。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两校的数学系并入北大数学系，改名为数学力学系，由比他年轻的原清华系主任段学复担任系主任，江泽涵任几何代数教研室主任。他同样积极工作，与段学复相处很好。吴文俊由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时，他认为这是对吴"人尽其才"的使用而非常高兴。解放前1946—1948年陈省身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时，他从北大推荐了多位青年教师去跟随陈省身进修，其中一些人后来成就卓越，扬名国际。他1947年获得再度出国进修的机会，本拟再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但途经上海时，接受了陈省身的建议，并受到姜立夫的影响，改去瑞士苏黎士国立高工跟随霍扑夫（H·Hopf）教授进修，这期间，他还访问过德国、法国、苏联等国，使他接触到欧洲的一些数学大师，更加拓宽了发展学科的思路。据他回忆，当年他改去瑞士进修，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了解到国内形势已发生变化，想进修之后，能少些阻碍可以顺利返回祖国。果然在1949年8月8日他就返抵解放后的北平。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20世纪20年代立下的决心，即："期以50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实际上，只不过用了30多年的时间，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泽涵兄指导助手姜伯驹、研究生石根华在拓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即引起国际上巨大反响，被国际数学同行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关于不动点类理论的最新成果"，"突破了50年来这门学科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称江、姜、石为拓扑学的"新中国学派"。有的书里还编进了"姜伯驹定理、石根华条件"的内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自己

1994 年春节作者（左二）去江泽涵家给二老拜年

的科学巨子的成就反应得太迟钝了，经过长时间的曲折，他们这项成果才于 1978 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姜伯驹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泽涵兄晚年最高兴的一件大事。说起这件迟到的喜讯，泽涵兄的长子江丕桓在《回忆我受到的教育及父亲的朋友们》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75 年前后他才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下决心写一本专著《不动点类理论》。当时家中房子挤，他每天拎着一个书包和一个暖水瓶，到数学系里的教研室办公室去写作，星期天及节假日也不中断。初稿写成后，出版是不可想像的事，惟一的办法是自己出钱，设法刻蜡版油印。粉碎'四人帮'后，江春泽把这事间接地反映到了当时主管科技的方毅那里，这才引起新华社记者来采访，科学出版社出书等事。"丕桓写的这段话，大概是他的父母说的。既然他提到我这个当事人，又应丕权、丕栋之约，我就把《不动点类理论》出版的前后经过稍作详细叙述。

1975 年，一次我去泽涵兄家串门时，他和我谈起，他收到一个朋友寄赠他一本国外出版的数学专著，是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布朗教授（R·F·Brown）著的。书的最后两章就是阐述他与姜伯驹、石根华的研究成果。他看后觉得作者仍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尽管把他们成果提到了重要地位，但对成果的重要意义仍有轻贬的痕迹，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写一本专著。

燕南园是在北大校园内一处供老教授居住的旧宿舍区，园内绿树成林，鸟语花香，曲径通幽，每位老教授有一幢两层楼的小别墅。可是"文革"期间，江泽涵独户居住的 51 号搬进了多户人家，留给泽涵兄家的仅是二层楼上的一个套间，里间稍大，既是两位老人的卧室，又是这位大数学家的书房兼会客室。外间小些，由长媳何高慧及孩子居住，兼做餐厅。房间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祖孙三代长年挤在这里，既拥挤，又不安宁，这样的环境泽涵兄怎能安下心来写书呢？他只好向系革委会借一间办公室写作。系革委会虽然同意了，但那间办公室他只能在革委会不开会的时候使用，如果开会，他只好将写作用的资料暂时堆放在地上。为了同开会时间不冲突，他有时就起早去写，或者趁人们吃晚饭时去写。就是这样艰难地呕心沥血，才写完了书的上半部。我当年就常常看到他拎着一个书包和一个暖瓶去办公室或由办公室蹒跚地回家，心里非常感动。

1976 年 11 月，我刚完成了人民出版社组织的编书任务回校。去泽涵兄家说起我参与编的一本书《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就要出版了。他忽然感兴趣地问起，"你们的书由哪里出版？怎么才可以出版呢？"当时，我觉得他的提问好天真，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不知道书在哪里出版和怎样出版呢？于是和他攀谈起来。原来，在"左"倾流毒泛滥的那段荒唐年代，使这位满怀报国之心的大科学家，既想把拓扑学的"新中国学派"成果实事求是地总结出来，奉献给国家，又要避免被扣上"追逐名利"的帽子，所以，这本专著的上册署的是"数学系革命委员会"的名字，而不是他个人之名；他不仅不试图获得什么稿酬之利，还自己请北大一位已经去世的教授的夫人徐毓楠

刻钢板油印了100本。我看了那个油印本,真是哭笑不得。一本走在世界前沿的“新中国学派”的科学巨著,竟然是油印本!他说,像这样抽象的理论书,出版社是不可能列入出版计划的。他还提起,“文革”前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过《拓扑学引论》第一、二分册,当第三分册交稿时,“文革”的风暴已经刮起来了,出版社通知他此类基本理论著作停止出版,从而原定的出版计划流产了。我听了他的一番叙述,为科学和科学家的遭遇感到寒心。我允诺,我将把此事放在心上,多方了解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使他的巨著正式出版。

后来,与我在同一个编书组工作过的方惠园说起她父亲方毅被中央派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她父亲感到自然科学遭到的破坏并不比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非常糟糕的。我听了方惠园的话,就谈起江泽涵写书出书的事。她听了很感动,要我立即把这本油印小册子交给她,送给她父亲看。不久,方惠园告诉我她父亲翻阅过了,立即请“三钱”(指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组成“评估小组”提出评估意见。评估小组对之评价很高,方毅决定由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一次朋友间的随意交谈竟成全了一件有利于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大事。当出版社正式向江泽涵约稿出版时,北大数学系革委会拟组织工农兵学员和江泽涵教授一起集体撰写,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事。因为“文革”期间拓扑学的教学与科研都停止了,工农兵学员根本没有上过拓扑学课,怎么能参与撰写国际水平的专著呢?这时已是1977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工作。江泽涵艰辛著书难于出版的事例,我也向中央宣传口领导反映过,后来新华社记者何黄彪多次采访写成的《坚持不懈,攀登高峰》的报道在1977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刊文表扬和国家科学出版社的正式约稿,推动了北大数学系重视起这件事来,组成5人专家小组(包括姜伯驹、石根华、尤承业、丁正良等)帮助江泽涵撰写。他们奋战了四个月,于1977年12月全书定稿交出版社。这本历尽艰辛的巨著,终于在1978年出版面世,1986年再版。并由江泽涵亲自译成英文,由德国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与中国国家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至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在“文革”中停止出版的《拓扑学引论》第三分册,我也给上海市“文革”前主管过文化出版工作的领导写了信反映情况。随后,该出版社也来人与作者商讨修改计划,于1978年初将三册合订出版,并连续印刷了4次,共6万多册。

这两本书第一次印刷出版后,泽涵兄夫妇来我家将书赠送给我。泽涵兄并在《不动点类理论》一书上亲笔写下:“春泽,没有你的帮助,此书难于这么快地问世。”当时,他真是喜形于色。

20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缅怀泽涵兄,心潮起伏。如果泽涵兄活到今天,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科学在神州大地更加蓬勃发展,看到大量海外人才归国以及国内人才脱颖而出的大好局面,该是多么喜悦多么欣慰呵!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亚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方 徨)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我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按封三新址)

2001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铁书生周小舟

●华强

90 年前，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平乡狮龙桥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周怀求。

“五卅”爆发，长沙召开万人声援大会，儿童团员周小舟是湘潭县年龄最小的代表。周小舟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秋，周小舟考上了省城的私立明德中学。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曾在这所学校执教过，周小舟十分敬仰辛亥革命领袖。在学校里，周小舟结识了共产党人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周小舟能说会写，他用自己主编的《明德校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马日事变”时，15 岁的周小舟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了。面对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与明德学生会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应变。

1927 年周小舟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为普及平民教育，他担任了明德平民学校教务主任。

1931 年 8 月，周小舟从湖南大学预科班毕业，靠“周公奖学基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就读。在北京学习期间，周小舟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团结北平爱国师生，积极投入民族救亡活动。1935 年 4 月，周小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周小舟进入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奉命参加南京谈判。这时，他正式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

周小舟四上南京，唇枪舌剑，在谈判桌上表现得英勇机智。谈判结束后，他将谈判的所有资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聪颖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泽东喜爱，党中央将周小舟调到中央军委，给毛泽东当秘书。

周小舟当秘书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委派他到新疆盛世才处宣传抗日；后又到山西阎锡山那里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周小舟还曾以毛泽东个人代表的身份在太原宣传抗日，争取群众。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毛泽东十分满意。

1938 年秋，周小舟离开延安，担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 8 年抗战中，周小舟在前线呆了 7 年。在冀中的 11 年间，周小舟几乎走遍了晋察冀。他办报，办民校，扫盲，开办干训班，还做瓦解敌军工作。

1945 年秋，周小舟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开始，周小舟亲自指挥艰巨的平汉线北段的支前任务。后周小舟调华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1949 年 8 月 4 日，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率部起义。周小舟随中共代表团进入长沙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周小舟的直接领导下，《新湖南报》诞生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开始播音。

1951 年 1 月，周小舟任湘西区党委书记。经过 20 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肃清残匪、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支援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

1952 年 11 月 19 日，南洞庭湖垮了几个垸子，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周小舟走上第一线，担任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他组织 85 万民工上堤，经过 4 个半月的努力，堵口 62 处，开挖引河 17000 多米，清除废堤 53300 米，共完成土方 8611 万方，另修建了两座现代化的大型水闸，蓄洪量达到 63.6 亿立方，还增加耕地面积 30 万亩。

1953 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周小舟根据农、轻、重的关系，规划工业布局，建设机场，发展交通。开发了湖南磷矿，还对 141 个港口作了不同的处理，发展内河航运。

1956 年 6 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十分满意湖南的大好形势。他对周小舟说：“苏东坡

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周小舟意气风发驾着湖南大船走进1957年。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的暴风骤雨,周小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到了9月,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十分“辉煌”,“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报》编辑部里,竟揪出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那些敢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都成了右派。

眼前的现实,使他坐立不安。然而大局已成,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只有因“多日失眠,精神不佳”违心地退避。中央批准了周小舟要求休养的请求。10月,他心事重重地来到青岛疗养,一头扎进了《资治通鉴》……

1958年,全国开始出现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泛滥。

黄克诚曾私下对周小舟等同志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

周小舟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提法持保留态度。他对公共食堂,提出了三条比较实事求是的办法:1、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2、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3、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他不赞成所谓的大炼钢铁。他请了炼钢的工程师、老同学吴鉴光来察看省委院内的土高炉。吴认为,土法炼钢,炼出来的东西铁不像铁、钢不像钢,根本达不到技术要求,是人力、财力的浪费。周小舟决定停止土法炼钢。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湖南搞调查研究,周小舟陪同他视察湘潭。经过三天的接触,周小舟发现他俩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谈得十分融洽。彭德怀给当地的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

1959年4月,周小舟和省委的一些同志微服私访,他把调查所获的材料归纳为12个问题,主要为:反“共产风”,反浮夸,取信于民,稳定人心。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7月2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把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方针。

6日,周小舟到彭德怀那里聊天,说到粮食产量虚报的问题,周小舟坦然相告:“是压出来的”。

11日,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他们先后都当过主席的秘书。毛泽东与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周小舟把群众的呼声和基层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这是一次神仙会,毛泽东并不在意,只说:1958年的有些事他也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14日晨,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万言书。

1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开会时,周小舟表示赞同彭总的信。

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性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周小舟、李锐、周惠听了震惊不已。周小舟说:“主席的讲话很像斯大林后期,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决定,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说:“主席年纪老了,变得太快?”

三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去找曾经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正巧彭德怀因工作上的事情,也来找黄克诚商量。三个人见状便告辞了,想不到这事却被人报告了毛泽东,以致成为后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非组织活动”的证据。

8月3日,到会的同志分成三组,展开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的批判。

16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于是,在党的

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17 日，周小舟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会后，周小舟到了北京，闭户不出，写了“认罪书”。然后，回湖南接受批斗。

9 月 15 日，湖南省委召开省委全会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会议决定让周小舟去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接受改造。

周小舟（右四）1959 年在庐山

1959 年 10 月 2 日，周小舟来到了大瑶公社。

1960 年春，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去参加劳动。路上看到上千的男男女女毁掉现成的油茶林和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此情此景使周小舟直掉眼泪。周小舟来到了指挥所，对组织指挥的干部说“共产党员能这样吗”？尽管他身处逆境，仍然反复多次耐心地说服教育公社干部，公社党委终于作出决议：坚决制止毁林开荒，坚决制止大兵团作战，实行“四定一奖”的包干责任制。

面对遍地“浮夸风”的严峻现实，周小舟十分忧虑。他常常夜不能寝，食无滋味，人也消瘦了。公社干部心疼地劝他想开些，他说：“这样搞下去，我们会失去几亿农民，失去整个农业，失去其他的一切！我们不是秦始皇，把农民搞成这个样子，能睡得着吗？”

1961 年，农村的日子更艰难，每人每月的口粮不满 30 斤谷。县里大检查，要开支一笔招待费，无形中又加重了社员的负担。周小舟晓之以理，说服来大瑶的检查团，不搞迎送，不办酒宴，为社员、为国家分忧。

1962 年 4 月 28 日，周小舟离开大瑶，调往广州。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

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的家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

周小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不得不将他珍藏多年的历史文物付之一炬，他一边烧，一边放声痛哭，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 年 12 月 25 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 8 时报到，“集中反省，劳动改造”。

这一天晚上，周小舟在家里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多年的失眠，使他经常服用安眠药品，这一次，他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12 月 26 日早上，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周小舟已离开了人间。那年他 54 岁。

周小舟平反后，他的生前好友李锐作诗一首，表达了对他深切的怀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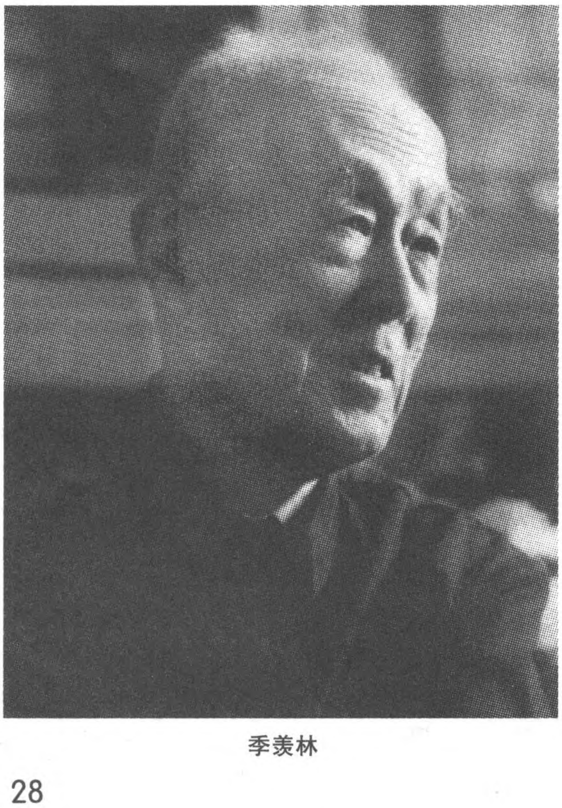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　文）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介绍老学者季羡林、老作家马识途的两篇文章

编者按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上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已20多年了，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重新站立起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但那场浩劫产生的深层次多方面的沉痛教训，却是无数血泪换来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本刊现应读者要求，特发表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沧桑》一书的序和前言，作者为季羡林、马识途。两位著名老学者，曾深受“文革”之苦，却以冷静的科学心态，告诉我们如何加深认识那段惨烈而又厚重的极有意义的历史。两位老学者在文中都殷殷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不要淡化更不可忘怀这段历史，不然，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还有可能在我们国土上重演。



季羡林

马识途

《沧桑十年》序

● 季羡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 20 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 1976 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的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

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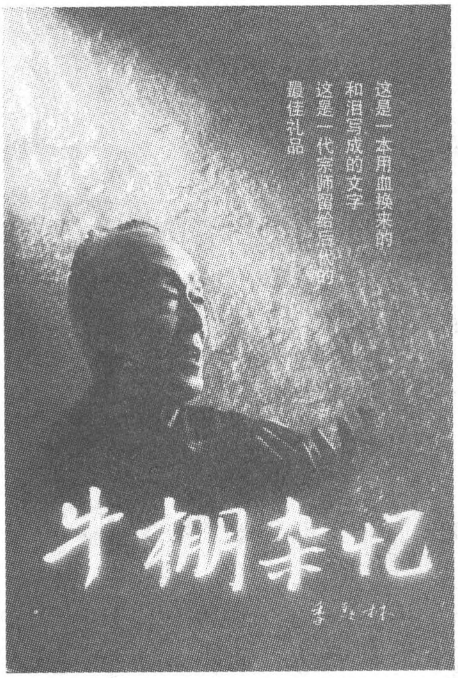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季羡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今年91岁,曾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国当代名教育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民族学家。

2001年5月17日,是季羡林90岁华诞,北京大学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特别致信祝贺。李岚清的贺信说:你热爱祖国,为人正直,诚笃敬业,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沧桑十年》前言

● 马识途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这个《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功勋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确实的。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蛮、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归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经历过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但是，这一件旷古未见、世界少有的历史事件，问起我们的儿女辈来，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还有一点模糊印象。问起我们的孙辈来，他们却连“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了。我的外孙就是这样，我的女儿对他说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听起来简直以为是在说神话，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此说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除开从历史书中抽象地了解到一点历史概念外，他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惊人事件，他们的祖辈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唐岁月。至于中国特有的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请罪”、“武斗”那些具体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语录仗”、“佩大像章”、“传芒果”这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情节，他们再也无法想像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专门的历史考证学家来发掘、考证和注释这些中国土产的专有历史名

词。这种事情在官方的文书里，在历史档案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和形象的描写。

后世的人们谁能想像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这样的怪事?党的革命领导干部，一夜之间，统统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被号称最高统帅的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抓起来关上，给他们的头上戴上种种帽子，给他们造出种种离奇的谣言，印出种种批判的材料，在“无产阶级”的报纸上登了出来。在那些“文明监狱”里，对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进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偶像请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让喝水。没完没了地批判斗争。把你拉出去戴上几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还插上几尺长象征反动官僚的乌纱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颈上挂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写着各种名目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走资派”。有更残酷的用铁板和钢丝挂在你的颈上，立刻叫你的颈上鲜血长流。那些天兵天将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绳子牵起来，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着一大串像送丧似的造反派的“专政队”。还有别出心裁的，叫走资派在手里提起小锣，边走边叫：“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们发明的无论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创造性地在走资派的脸上涂上黑墨或油漆，以证明他的确是“黑帮”。如此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总之，谁把“走资派”折磨得最惨，最有创造性，最有艺术性，谁最高明。这样的荒唐事情谁要表示反对，那就要拳打脚踢，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据说这是根据某种经典上的规定和北京来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众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单位细细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斗。最标准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听任“专政者”把你的身子压弯，使你的头快要挨着脚背了。如果听任你的头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们要抓着你的头发，强力叫你的头仰起来，向前方看，以便于让台下的“群众”看看你的“丑恶的嘴脸”。在这同时，要你的双手在背上倒举起来，像一个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这就是“喷气式”的来源和实际景象。

应该说这还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在那个“英雄世纪”里，是不乏酷刑的发明家创造出各种名目的特殊斗争形式的，要列举出来，真叫罄竹难书了。多少死去活来的惨叫，多少腰断腿折、耳聋眼瞎的残废，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踪的善良人、忠诚的共产党人，多少待死囚徒的囹圄岁月，气坏了身体，磨白了头发。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为在为保卫伟大的谁，去参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无知青年。多少祸从天落，殃及池鱼，横遭杀戮的无辜群众。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抢劫、打烂、烧毁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图书资料、历史档案。谁能想像得到中国会遭到这么惨重的历史浩劫?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谁也不会怀疑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是在无数善良的干部和群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善良愿望下进行的，是在无数诚心诚意革命的青年怀抱极大的狂热下进行的。我敢说除开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外，上上下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想把中国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弄到这样的结果?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损失了成千成万的好干部，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十几年宝贵的建设时光，损失了几千亿元的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头脑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样的怪事？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怎么才能使这种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这一切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当领导的许多老革命，特别是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说来，都不能算是自己历史上光辉一页的事，尽可能快地忘记掉。告诫大家不要再去回忆和议论“文化大革命”。他们这种作法的动机无疑也是善良的，虽然这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人民未必有什么好处。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产生的根子没有被挖掉，同样的悲剧还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那形式可能更为暴烈，那后果可能更不堪设想。

有的人把这一场历史悲剧，简单地归罪于某些政治阴谋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流的破坏和捣乱。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定的历史结论，可以安抚许多受害的干部和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历史深层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头脑变得更清醒起来。正如把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几个宦官、内戚和佞幸

之臣，以至把一切罪过归于一个妇人一样地荒谬，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有的则更简单地把原因归于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陷，说他晚年畏惧大权旁落而剪除异己，自以为永远正确的金口玉言不容冒犯,听信佞幸和亲爱者的谄媚和蛊惑,如此等等。这当然也可以找出许多事实的依据,言之成理。有时某些事实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一时进程。然而这却直接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定理,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上起推动或阻碍历史的作用，而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历史的条件下，最高领导如是另外的一个人，也可能干出同样甚至更为荒唐的事来。

显然，要找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必须找出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必须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经济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国际环境,以及领导人的气质个性,国民的劣根性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轨迹。以这样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才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历史的重演。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本于历史事实。只有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生动的具体的事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回忆那一段历史事实,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亲罹其灾的政治家,特别是文学界的同仁们,应该用自己的笔把自己亲历的或见闻的事实,记录下来。

我想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形式记录下来，在我被点名批判斗争的第一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斗被关监的时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听任他们那些革命斗争勇士们拉来扯去地斗个没完，哪有工夫来写回忆录。就是我写的片纸只字,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受到极其严格的检查。他们无中还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纸只字给他们拿到了，将有什么样的大祸临头,那就不言而喻了。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惟一的以至是狂热的愿望,就是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看一看那些响当当的革命派们的精彩的表演，特别是他们的下场。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跳梁小丑,会真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当权者。我相信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比我们更好。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在最高领袖于 1976 年的 9 月 9 日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四个“旗手”(他老人家不满意时称为“四人帮”)和以造反为职业的天兵天将的坏头头们,很快被揪了出来,由人民的法庭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纷纷垮台,昔日的跳梁小丑,有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们也夹起尾巴,听候发落,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这个被他们踏上一只脚认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过来，重见了天日，落实了政策。那时叫做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团聚,涕泪滂沱。许多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来的总算又得机会见面,唏嘘不已,恍如隔世。文学界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更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来描述那荒唐时期的荒唐的人们干的荒谬绝伦的事，无不唏嘘流涕，以为三生不幸，生不逢时。有的朋友却说不是生不逢时,遭受了不尽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时,三生有幸，得见过去作家和外国作家从未见过的千奇百怪的事。这么丰富的写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已经是八十出头的人了,每月领着虽然不高却也不低的工资,我尽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种花,或者去活动室参加方城之战，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汉界上，杀它个落花流水,颐养天年,静静地听候马克思或者阎王的召唤,岂不快哉!但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驱使着我,要我把现在还老闯进我的噩梦中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和事,记录下来。

我鼓足勇气,写了起来。可是写了六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想法,迟迟没有拿出初稿来。“文化大革命”已过去 20 多年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多少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书,我写的这一本《沧桑十年》,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我不想宏观地来描绘这场“大革命”,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实在地记录自己当时所受、所见、所闻、所感。这里自然要接触某些人和事。可能有的人看了感到不安逸，甚至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那也只好由他。我相信时代变了,即使那些“四人帮”阴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头上戴上几顶帽子,陪我进棺材去,也办不到了。如果有什么关碍,不能出版,那就留给子孙,或者束之高阁,让老鼠和蠹虫用牙齿去批判吧。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 宋政厚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快步走进甘肃分社夏公然社长和我这个记者代表住的房间。他在递给夏公然一封信件的同时，义形于色地说道：好惨啊，一个省委第二书记给活活整死，才17岁的儿子为父奔走呼号，头发都白了。这就是那个孩子写给周总理的信，小平同志作了批示，你回去后组织力量就高健君之死这个案件好好调查一下。老夏就这样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返回兰州后，老夏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和吕南新同志，并且千嘱万咐，要我们周密谨慎地调查，实事求是地反映。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严峻，老夏再三强调注意工作方法。接受任务后，我们出于策略，先是向当时甘肃省委领导人禀报，并亮出有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一"尚方宝剑"。当对方无可奈何地同意调查后，我们先要求省保卫部送来有关高健君的材料，"案卷"之厚，3尺有余，翻阅一遍，只见字里行间充满杀气。继而要求省保卫部长介绍案情。这位部长表情严肃，语气强硬，但底气不足，自始至终目不离卷，总是照本宣科，生怕说出"纰漏"。讲到对高健君一案的结论时，他用法官宣判案件的声调说："高健君自193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党做过一定的工作，但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在审查期间，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组织的审查，于1969年3月8日自杀身亡，是极其错误的。"接着，我们又找到负责"高健君专案组"的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面孔瘦削，巧舌如簧，竭力为专案组开脱，还把监管领导干部的地方说得就像干休所一样美好。看来要把高健君一案弄个水清石出，非要还得在深入调查上下功夫不可。

一个礼拜天上午，我们散步似的走进了省委宁卧庄家属院，按照事先打听到的地址，绕到高健君的住宅，先敲前门不见应声，转到后门再敲，依然没人回应，可是侧耳静听，屋里却有动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慢地敲，霎时，后门拉开了一道门缝，闪出一张神情极度紧张的老妇人的面孔，她声音颤抖地问道："你们找谁？"我轻声细语地回答："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是找高健君夫人的。"并说他们写给周总理的那封信已经得到小平同志的重视，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我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位突然出现的中年妇女在把门缝拉大的同时，连声地说："快进，快进！"她把我们领进一间拉紧窗帘的小屋，并示意我们落座。当察看我们主动出示的"新华社记者证"和那封信件后，那位中年妇女泣不成声了。过了一会儿，才边擦眼泪边开口："我姓雷，是高健君的老伴。刚才我们从门缝里早看到你们俩了，以为是专案组的，吓得不敢吱声，这几年我们一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出门有人盯梢，来客有人盘查，寄封信的自由也被剥夺，孩子为他爸写过多少封鸣冤信，都被搜查走了，这封信是他偷跑到河南省郑州发出去的，省保卫部知道后还在通缉

他哩。”

“现在你们不用怕了,对高健君同志一案，小平同志有批示，新华社朱穆之和穆青两位社长都很重视，我们奉命调查也已征得省委领导的同意。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今后还可以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去谈。”我们的这番话消除了她的不少顾虑，她开始悲愤地诉说着高健君一案的始末，还有她收集密存的证人证词和证物。说到无数伤心处,她呜咽流涕。这次不知不觉谈了5个小时。临别时,她才把藏在另一个屋子里的小儿子叫了出来和我们见面:“信就是他写的,专案组一直在抓他，我们给吓怕了。”

根据她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先后走访了当时和高健君关在同一楼层的难友、监所的警卫人员、勘测高健君“上吊自杀”现场的法医和检察官员，以及专案组的其他人员,之后还专门查看了出事现场,并向火葬场为高清洗尸体的一位老职工了解了他所见到的惨状。就在这段时间里，高健君夫人多次来分社反映情况，并把她精心秘藏的一提兜高健君的血衣送到分社。她说:“这是监管所的一个好心人冒着危险给偷出来的,我保存了多年,但我家很不安全，只好求你们给暂时收藏一下,有朝一日可能有用。”她还告诉我们,高健君的遗体,当时在几位同情他的殡葬人员的帮助下，由她主持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下葬，目的也是为了有朝一日重见天日后再检验尸骨。专案组曾多次逼她交出尸体,她都顶过来了。

对案情有了基本了解后，分社主要领导又指示我们接触曾和高健君共事过，如今又在兰州的原甘肃省委常委，其中包括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主要是听听他们对高健君过去的表现和对高健君之死的看法。

我和汪锋不曾相识。我只知道他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上很有一套,是“文革”中全国第一个被“打倒”的省委书记。汪锋中等身材,额宽脸方,穿着一套旧蓝布制服，他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诧，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已65岁了,记忆力很好,他告诉我们,从1966年中到1967年初，他们一伙“黑帮”常被揪斗惨打,有几次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比他小9岁的高健君，在这期间常常趁看管者不备，挤到他的身边悄声地说:“你要想得开,千万别走绝路啊！”使他增添了要活下去的勇气。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对我们正确分析高健君一案很有帮助。

交谈快结束时，汪锋两眼含泪说:“我都八、九年没给党做工作了，心里非常不安。如今,身体还不算坏,还可以为党做些事情，新华社能不能把我此时的心情告诉毛主席，希望中央把我的组织生活恢复一下,我要学习。”

当我们完成对高健君一案的调查，并写出详实的材料发往新华总社后，分社领导即向穆之、穆青同志反映了汪锋同

汪 锋

高健君

志的心愿，并很快得到了“可以调查”的答复。

调查任务照旧由我和吕南新承担。我们像调查高健君案一样，先向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汇报，并请他指示有关部门特别是省专案组负责人介绍汪锋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关材料和方便条件。当时省委领导和专案组负责人对此都十分敏感，私下问我们是不是又有什么来头，并再三表白他们实际上正在认真落实对汪锋的政策。可是，专案组有关人员向我们出示的一份省委于当时给中组部的报告，却在罗列汪锋几大路线错误后说：“汪锋同志对其所犯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态度也不老实，省委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后转变也不大。”这使我们感到专案组的两面三刀，是汪锋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所在。

调查的第一步，还是阅卷宗看材料，及找省委领导和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谈。身着军装的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和身着军装的省委主要领导，言及汪锋近50年的经历，不是追随王明、接受所谓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散布消极悲观言论、鼓吹农村单干，和在统战工作中搞投降主义。他们的结论是：汪锋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历史关头，拥护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不言自明，他们是不同意解脱汪锋的。

接着，我们便到汪锋家向汪锋本人调查。那天，他夫人陈芳同志先迎上来并情不自禁地说：“怎么现在落实干部政策的事也叫新华社管啦？”

落座后，汪锋颇有兴致地从他1926年在陕西蓝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谈到1958年走上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从“过五关斩六将”，谈到在“文革”中蒙受奇冤，身陷囹圄。他告诉我们：前些天，一位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提审他，说他态度仍不老实，他诙谐地答道：“你们怀疑我有这个那个历史问题，我解释你们不听，难道非要叫我像西藏的农奴那样弯腰打哈，去接受那些本不是事实的东西，才叫老实吗？”说得那位负责人无言以对，拂袖而去。

汪锋对我们说：“我希望把我的组织生活尽快恢复，让我有机会通过参加学习，把思想清理一下，然后让我工作，至于到哪儿去？做什么？我没有任何要求。八、九年了，我没给党做事情，光白吃饭，于心不安啊！”

出于减少片面性的考虑，我们照例走访了与汪锋共事过的原省委几位常委，听了他们对汪锋和对省委处理汪锋问题的看法。

调查得到的大量事实说明，汪锋同志无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于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秋，他利用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党的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兰州等地积极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并于次年4至9月先后发动了两当、靖远、西华池等多次起义；1933年3月，到达陕甘边区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参与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前夕，他受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委派，化装潜入西安，作西北军工作；1939年初，他协助欧阳钦同志，在天水创建了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扩大发展了这一带党的组织，后在担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期间，把党的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逐步扩大到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解放后，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西北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1月，在甘肃人民生产、生活面临极端困难的时刻，他受命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甘肃后，大胆提议把安排人民群众生活放在省委工作首位，果断决策“开仓放粮”，尽力把群众从饥饿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还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的报告。认为“只要真正按群众意愿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他的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受到群众的好评。

有人还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插曲：“文革”开始不久，他和当时省委的几个“黑帮”，被一伙人揪到陇西县批斗，事先指定好的一个“积极分子”大步流星地冲上台来，指着汪锋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黑了心的走资派，（下转38页）

日军弹药车旁的遗书

● 刘大为　傅　克

抗日战争初期，活动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被编为八路军挺进军，随时准备向东北挺进，去解放在日寇铁蹄下的3000万东北同胞。那时我们非常喜欢一支歌和一首诗，以及还没听完的一个故事。

那首歌的歌词是：“松花江的旁边，长白山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在血战，英勇地保卫着黑水白山，战死的埋在那里，活着的站在前线……在那里会见联军的兄弟，在那里我们要一同作战！”

诗是萧三同志的《礼物》，是一位从延安来冀东的同志带来的，诗中叙述了一位日本侵略军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当他所在的联队正向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之时，他把装满一卡车的子弹，开到山林中，留给东北义勇军作为“礼物”，然后，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留下遗书自杀了。这首诗，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员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也折射出东北义勇军的斗争信息。然而，诗中所写，大概是由于材料所限，描绘的情节太简略，既没有写出发生这一事件的年、月、日，也没写出这位日本共产党员的姓名，以及遗书的内容，它成为我们“没听完的故事”。多年来，我们一直追寻这位给了东北义勇军巨大帮助的、日本共产党员的详细情况，至今，整整62年了。

直到今年，周保中将军诞辰百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从周保中生前撰写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和杨苏、杨美清合著的《周保中将军》两书中，才得知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

周保中

1933年初春，距吉林省安图县城300多里的嘎斯河下游，活动着一支由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马家屯一带和日本侵略军鳖冈村一旅团的部队打了一次胜仗，在大肚子川沟打扫战场时，抗日救国游击军别动队队长李光发现地上有汽车轮子印，感到奇怪，这里离公路很远，怎么会有汽车轮印？他沿着汽车轮印向森林远处寻觅，竟然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一辆装满子弹的日军大汽车！他高兴地令战士们把子弹箱搬下车来，一点查，整整有10万发子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上天助我抗日部队，要不日军怎么会把汽车开到深山密林之中？难道是汽车迷了路？正在迷惑不解，一位游击队员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具日本士兵尸体，旁边地上还有一支手枪。大家越发感到奇怪，这里是日

本侵略军没有到达的地方，也没有发生过战斗，怎么会出现日本士兵尸体？正在此时，一位游击队员在距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块石头下面压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页，上面写满了字，懂日语的战士把它翻译出来，原来是一封不平常的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散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运送贵军，它藏在北边的森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身虽死，但革命精神永存。

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战斗之后，周保中得到了李光同志的报告和伊田助男的遗书时，他被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立即指示李光用伊田助男的事迹，向军民进行宣传教育。根据周保中同志的指示，清明时节，抗日游击军的同志们和马家屯的群众一起，把伊田助男的遗体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抗日游击军烈士，合葬在一起，他们生前，为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分别战斗在不同的阵营，现在，他们又共同长眠在白山黑水青林翠谷之中。1933 年 4 月 3 日，抗日游击军的同志又和马家屯的乡亲父老一起，在伊田助男的墓前召开了感人至深的追悼会，大家在会上倡议把马家屯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2002 年是周保中将军的百年诞辰和伊田助男为正义事业献身 69 周年，让我们用这篇短文，作为一束鲜花敬献给伟大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

（责任编辑　刘　文）

（上接 36 页）1958 年你不顾我们的死活，大刮浮夸风，害得好多人没有饭吃，家破人亡。”说着说着就要对汪锋动拳动脚了。汪锋这时赶紧抬起头来说：“兄弟你弄错了，我 1961 年才到甘肃，中央叫我来就是纠正浮夸风的。从 1963 年开始，政府不就动员大家吃爱国肉、购爱国油吗？”这个“积极分子”傻眼了，慢慢地放下了拳头，逗得全场轰然大笑

1975 年 8 月，当我们把一篇为他请命的内参发出不久，北京刮起的一股批《水浒》风传到了这里，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一下翻脸了，在有夏公然同志列席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他声色俱厉地发出警告，说甘肃现在有一些受审查的人在搞翻案活动，汪锋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有人在同情、支持。政治嗅觉灵敏的汪锋面临这股突如其来的寒流，不得不整天蛰居家中。

一年多后，“四人帮”粉碎了，专案组放松了对汪锋这类人员的监控。汪锋因而又和新华社甘肃分社取得了联系，并请分社向省上领导转达他的几点要求，包括为他安排检查身体，把从他家抄走的全套二十四史及马恩全集如数归还，希望自己尽快出来工作。出人意料的是，新华分社领导这次为汪锋请命，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1977 年 7 月初的一天上午，汪锋同志身穿一套米黄色的毛料中山装，再次来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告诉我们他是来辞行的，说他即将去乌鲁木齐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主持区党委工作。我们为之高兴，向他祝贺。他一再说：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还说新华社是他的患难之交，他会没齿难忘。

说来也巧，1978 年夏，我调回新疆分社不久，随同新疆分社社长成一在昆仑宾馆参加区党委的一次重要会议，有天去餐厅吃晚饭，我们坐在一边没完没了地聊着。不大一会儿，陈芳抬头时和我相望，她惊讶地向着汪锋喊出声来：“你瞧这是谁？”汪锋顿时把目光转向我说：“这是新华社老宋，他调来新疆后我们见过面了！”接着，他便给在坐的其他同志滔滔不绝地讲起了 1975 年新华社在他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的故事……

（责任编辑　杜　晋）

中国第一位日语播音员 原清志

孙建和

原清志出身于日本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早逝。原清志15岁就出去打工。她参加了反抗统治阶级剥削的革命组织，跟着大伙到工厂、农村宣传革命，当大人们开会的时候，她就守候在门外放哨。18岁那年，她与一个革命者恋爱结了婚，生了个孩子。一天，她丈夫正和一些同志在屋里开会，原清志在屋外放哨，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忙通知开会的人收拾好文件，迅速撤离，几个人冲进来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什么也没搜到，只得悻悻走了。原清志的丈夫被捕，在狱中得了肺结核，放出来后，终因久病不治去世。那年原清志才23岁。

几年以后，原清志结识了一位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与他相爱并结了婚。这位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准备将家安顿好就接原清志来中国。不久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原清志赶紧打点行装，带着孩子于1937年3月来到中国。她将年幼的孩子放在丈夫的老家后，随丈夫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原清志以瘦弱的身躯转战于烽火连天的战场。1940年八路军在中原发动百团大战，原清志的丈夫正在河南一所八路军兵工厂当厂长，形势非常吃紧。原清志由于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在同敌人的周旋中，陈赓将军为了照顾她，特地分给她一匹马。靠着这匹马，原清志多次遇险都逢凶化吉，及时躲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一次日寇包围了兵工厂，她骑马跟着大家突围，却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受了伤，只好让大家用担架抬着走。战争年代的一次次出生入死，一次次化险为夷。1941年在朱德总司令的关心下，彭德怀亲自找原清志谈话，决定发挥她的特长，调她到八路军总政敌工部工作。原清志欣然服从组织安排，与丈夫一起于1941年10月奔赴延安，参加了日语广播的筹备工作，并在是年12月3日拉开了日语广播的序幕。也就在这一年，原清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播电台设在离延安城西北20公里的一个叫王皮湾村的几个新开凿的窑洞里，那里地势偏僻，交通十分不便，需要每天从驻地骑马去王皮湾村。播音间只是一个六平方米左右的窑洞，不光广播器材简陋，连电力供应也没有。找到唯一可以利用来发电的一辆破旧汽车的引擎，由于没有汽油，只好利用烧木炭时产生的瓦斯代替汽油作燃料。发射天线则是用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搭建成木塔天线，发射的功率只有300瓦左右。就是在简陋的窑洞里拼凑的设备，她用日语报出："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创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先河。

几年前，已是耄耋之年的原清志，应邀从沈阳来到北京，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她来到日语部，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回顾起漫长的八年抗战岁月，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

● 穆　欣

1927—1931年间周恩来创建和领导的中央特科，是党最早设立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构。它在我党建立初期，在白色恐怖下为巩固党的组织，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年，在中央特科聚集了许多智勇兼备的传奇人物，如像声震中外的名将陈赓，党的电讯事业创始人李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党部调查科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以及潜伏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宋”、“小宋”（宋启荣，宋启华），济世名医柯麟，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神出鬼没的外号“大块头”的欧阳新，血染沙场的陈寿昌等等，都是人们传颂的英豪。而兵器专家刘鼎和夫人吴先清的特殊经历和卓越贡献，尤为人们赞赏和景仰。

朱德、孙炳文在柏林介绍刘鼎入党

刘鼎（1903—1986），原名阚思俊，出生于四川南溪县城一个小康之家，幼年在家乡读高小时，学校里曾驻扎过朱德率领的云南护国军。这支部队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朱德成为刘鼎心中敬慕的英雄。另一位令他景仰的革命前辈，是南溪的大学问家孙炳文。刘鼎曾请孙炳文为他辅导功课，从孙炳文的言谈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早年在学校读书时，刘鼎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学时代就和进步同学郭伯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带头组织学生会，经常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宜宾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高中毕业后，他考取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暑假，他毅然离开只差一年毕业的高工，到上海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和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建立了通信联系。他见到过蔡和森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得知中国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的情况，十分向往。恰好这时和朱德一起去德国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1924年春，他跟随孙炳文乘火车前往德国。途中，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临时编进东方大学学生支部，学习了革命理论，还见到前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李大钊，听了斯大林所作《论列宁主义问题》报告。在这里的耳闻目睹，使他受到了许多革命思想的教育。

刘鼎到柏林后，听从孙炳文的劝说，改变了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到中共旅德支部报了到。不久，他随孙炳文到大学城格廷根见到了朱德。1924年12月，刘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旅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这时他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勤工俭学，用半年时间自学德语，达到基本上能说会听和读讲义，然后就在格廷根大学选学工业方面的课程。这期间，他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窘迫，常常是在饥饿状态中一面工作一面上课。

在革命斗争中和吴先清结成伴侣

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国留学生立即开展声援活动。中国留学生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一个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通电上签字。这个公使拒不露面，惹起公愤。刘鼎跟随朱德和大家冲进公使馆，终于在三楼的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出来，迫使他在抗议通电上签字。魏宸祖老羞成怒，勾结德国政府，下令把朱德、刘鼎和其他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逮捕、驱逐出境。

刘鼎（左）、李强（右）与艾黎

刘鼎回国途经莫斯科，又进东方大学参加短期学习和军事训练。1927 年，又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并兼任翻译，同时任中共东方大学总支委员和军事班支部书记。他在东方大学期间，认识了也在这里学习并担任青年团宣传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吴先清。吴先清于 1904 年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城关的一个商人家庭，是父母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子。她性格刚强豪放，幼年就冲破家庭的束缚，坚决不缠足、要求上学。五四运动兴起时，年仅 15 岁的吴先清正在杭州读书。她无视校方禁令，带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蚕校)同学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杨之华等青年团员一起学习革命理论，1924 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下半年经组织调到上海，在上海小沙渡(沪西区)工人学校教书，同时到女工中开展工作。1925 年她带领女工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8 月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这年初冬，党组织又派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中国班学习两年。

刘鼎与吴先清不期而遇，由相识到相知相爱，志同道合。1927 年下半年，他们在东大结婚。1928 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他们又一同转入中大工作。

为中央特科作出特殊贡献的贤伉俪

1929 年底，刘鼎和吴先清奉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刘鼎即到中央特科工作，吴先清先是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到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

刘鼎在由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任副科长，协助陈赓开展情报工作。他到特科工作不久，陈赓就把他直接掌握的重要情报关系杨登瀛(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是特科在上海争取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和杨度，交给刘鼎负责联系，并要他参与在立三路线的安排下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进行的全面调查和为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警戒工作，营救被捕的关向应以及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为一个从山东来的叛变者作拍照取证工作等等。

1930 年夏天，立三路线准备在上海举行武装暴动，下令中央特科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陈赓让刘鼎主持这次调查。由于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人手又少，难度很大，二科主要骨干都紧张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们为了调查帝国主义的船只情况，需要搞清每只舰上到底有多少炮位。可是敌人规定军舰附近不准船只来往，只有长途航船可以在军舰附近通行。他们设法找来一条大船伪装成长途船只，由自己同志驾驶到军舰附近去侦察，终于逐一地查清了全部实况，还设法搞到了吴淞炮台的地图。为了掌握外国兵营的实况，他们派人在兵营门口摆摊，观察每日进出人员和运进物资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推算兵营驻军的约数；在调查监狱和街道分布及建筑物的情况时，他们把项目分得很细，连建筑物的层数、结构和质量，以及街道如何交叉，外滩每幢大楼有多高，各楼间的距离有多远等，都作了探测和估算，为巷战和炮兵射击提供了各种数据。为了在暴动后我们能够控制上海的经济局势和金

融市场，还设法买到了上海市银行、大商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簿子，对各大银行、商号作了详细调查，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他们把侦察得到的种种情报，汇集成一厚本资料送到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那里。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在北京有一次见到陈赓、刘鼎，同他们谈起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时候说："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员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来说，也真不简单哪!"

刘鼎重视通过新闻渠道搜集情报。当时有位在《时事新报》任记者的王安之，他的友人办了家新新通讯社，在南京、汉口等地都设有分社，只有设在上海的分社不赚钱。刘鼎便让人给他送去些钱，维持这个通讯社，并派一个外号叫"大块头"的欧阳新去当记者。当时盘踞上海租界的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常想拉拢新闻记者给他们作宣传，"大块头" 在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处当翻译，又到苏联军事学校学过炮兵，外语很好。他就利用对方的这一企图，以新闻记者身份同他们打交道。1930 年春，杨登瀛发现有个叛徒史书元利用一品香饭店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联系，进行出卖革命的政治交易。此事经过陈赓报告中央特委后，周恩来当即命令中央特科二科、三科的同志全体出动，把一品香饭店团团包围。陈赓亲临现场指挥，刘鼎作为杨登瀛的专家，陪他进入饭店参加宴会，借此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大块头"则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饭店"采访"，准备把这个叛徒抓起来。结果敌人发觉情况有异，叛徒慌忙溜掉，这次行动受挫，有几位同志被捕，"大块头"也在其中。只因他个头高、块头大，英语说得流利，外貌又有点像白种人，口袋里装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名片，他又一直向巡捕抗议，要同某大使、某领事打电话，敌人不摸底细，看他"来头不小"，就把他放出来了。

刘鼎的夫人吴先清，在浦东地区做了半年女工工作，也在 1930 年夏调入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巷口开设一水果店，为秘密工作作掩护。那时刘鼎负责以无线电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夫妻俩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配合得很好。吴先清调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她的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得释，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与弟弟长谈中，知道他的被释是得到身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她弟弟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吴先清想利用这一关系来开展工作。征得陈赓同意后，她把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后来她又通过与陈某及其周围要人的交往，获得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得知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对帮助组织掌握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在此期间，刘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 1930 年夏天开始，利用日本人和国民党胡汉民改组派相勾结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搜集一些情报，通过特情关系向国民党发送，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利用改组派方面提供的揭露国民党的情报，编写成传单到处散发。周恩来看到这些传单，称赞这个办法很好。

惩治叛徒内奸，以免党组织受到损害，这是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一项重要任务。1930 年秋天，一个原是山东省委的负责人到上海来开会，在旅馆里被捕叛变，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的拘留所。警备司令部让杨登瀛见他，叛徒除了供出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别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陈赓派刘鼎以杨登瀛"专家"的身份前去给叛徒拍了两张照片。谁知那个叛徒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过，竟认出了刘鼎。刘鼎镇定而机智地搪塞过去，将情报带回来汇报，证实此人确是山东负责人。后来国民党见他的身份很高，又供不出更多的情报，就把他枪毙了。

1930 年 10 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蒋介石面谈，他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告诉蒋介石，让蒋派人找他接头。蒋介石把这件事批交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他的手下徐恩曾，徐恩曾又让杨登瀛去同黄第洪接头。杨把黄第洪秘密自首情况告诉刘鼎，刘鼎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立即报告陈赓转报中央。后来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确实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

刘鼎还参与了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1931

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英租界被捕，并被抄走一箱文件。周恩来指示，先通过杨登瀛去巡捕房打探情况。杨登瀛很快了解到，经过初审，巡捕房并未弄清被捕者的身份，而英国人对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一大箱文件倒是很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懂中文难以分辨哪些文件重要，哪些是不重要的，天天围着箱子转，想不出个办法来。

这时国民党却一直想把这一批文件弄走。英国人说，这个案子本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要杨登瀛找英国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Lanpson)，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鉴别。兰普逊正想从中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就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刘鼎前去“鉴别”。为了防备意外，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杨登瀛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兰普逊，把他带到巡捕房存放文件的房间。刘鼎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抽出其中的重要文件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后来，陈赓让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关向应既然不是重要“犯人”，就把他转交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关向应被捕后化名李世珍，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又没有捞到这些文件，也以为关向应并非“要犯”，不予重视。随后，党就设法把他营救出来了。

关向应1931年底出狱后，中共中央即派他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

敌人监狱里的严峻考验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彻底粉碎了敌人“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阴谋。周恩来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央特别委员会及中央特科进行了调整。决定原在特科与顾顺章共事多年的陈赓、李强、陈养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撤离上海，周恩来也及时隐蔽起来。刘鼎因过去同顾顺章极少接触，可以暂不隐蔽，仍留在改组后的中央特科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中央特科改组后，第二科工作由潘汉年接替，刘鼎把所联系的情报关系陆续作了交接，手上暂还留下与国民党改组派内一位“高先生”联系的工作。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激化，改组派加紧倒蒋活动。中共中央急需探知这方面的情报，刘鼎为此继续奔波。1931年10月10日晨，刘鼎去上海外滩公园同“高先生”接头时，不料早有特务埋伏在那里，刘鼎一到公园就被抓走。

刘鼎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决不吐露真实身份。他化名甘作民，伪造了个人经历，在龙华监狱里关押了十余天，又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二年，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刘鼎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对付敌人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刘鼎在南京监狱里按照秘密通信办法，和上海的中央特科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汇报了在监狱中了解到的情况。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派两名同志以亲属探监的名义看望他，并传达要他‘争取早点出狱’、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他根据这一指示欺骗敌人，力争尽快出狱。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出狱后，“他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们护送上火车，连夜赶到上海。他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并请求派他到中央苏区去。不久，潘汉年代表组织同意他的请求，安排他转移苏区。”（吴殿尧：《刘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三卷）

刘鼎这次能被“保释出狱”，与他的夫人吴先清关系很大。前文所讲“潘汉年派两名同志以亲属探监的名义看望他”，并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的，就是吴先清和她嫂嫂孙儒珍。“孙儒珍20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同乡，这些人到30年代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要职。为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人。嫂嫂先找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得到这位官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第二次姑

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李进德怕她们有危险，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再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因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至柔是同乡，又当过周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当周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按：临海方言，意即土匪婆)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当然，放出刘鼎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这次活动却非常起作用。吴先清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后来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另一方面，自己在这些关系的“保护”下，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赵子劼：《吴先清》，《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四卷）

刘鼎于1933年秋被保释出狱，回到上海。这年入冬，吴先清怀孕了。她和刘鼎商定，等孩子生下后，送回四川刘鼎的老家交由父母抚养。1933年春节前，他们回到四川南溪。不料刚过春节，有人向警察局告密：“阚家来了一对‘共匪’。”阚家在警察局工作的亲戚也来报信说，敌人正在布置抓人，要他们连夜出城逃走。得到消息后，他们仍靠这位亲戚帮助用箩筐把他们坠下城墙，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离开了家乡，回到了上海。不久，刘鼎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从此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1933年，吴先清经中央批准，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自己家去，请母亲抚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每天都以贵妇的打扮大摇大摆地进出于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有几家还与她来往特别密切，……使住在隔壁的上海市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怀疑。吴先清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来往给革命工作做了许多有效的掩护。1934年夏天，陈修良在日本东京，得知吴先清仍在上海负责一个组织的领导工作，即托人带口信给吴先清，把自己在东京的情况告诉了她，要求与中央接关系。吴先清一面约陈修良到上海来会晤，一面向上级汇报，讨论了陈修良今后的工作安排。陈修良一到上海就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并派她在东京工作。时隔不久，吴先清与陈修良又在东京会面了。陈修良对吴先清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独自大胆地跑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赵子劼：《吴先清》）

1935年5月，吴先清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她即被党组织召回上海，并于当年9月派她往莫斯科学习。她到苏联后改名罗莎（玫瑰）·拉库洛夫，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不幸在学习期满，等待回国期间，遇上苏联肃反扩大化，1937年11月间，她在莫斯科郊区马拉霍夫卡招待所被捕，被诬为“日本间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从此再无她的音讯。这年她仅33岁。后来虽然她的沉冤得到昭雪，她的生平事迹也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传》中。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3年初，刘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这时正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刘鼎途经赣东北苏区时，由于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只得暂时停留下来。方志敏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留他在赣东北苏区工作。由于他在苏联时曾在空军机械学院学习过，懂得一些兵器知识，就让他担任兵工厂政委。他亲自动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炮及炮弹，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1934年10月，方志敏率红军抗日先锋队向皖南挺进后，敌人对苏区大举“清剿”，1935年5、6月间，刘鼎在弋阳南山的山林里被俘。

经敌人的辗转押解，刘鼎被关押在江西九江俘虏营。他在审讯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说是途经苏区被红军俘虏的工程师。他常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敌人干点技术活儿，如修理汽车、钟表等等。敌人相信他是个工程师，就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还带他外出买菜、修理工具，他便利用这些机会探明周边情况，为出逃做准备。

这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刘鼎逃到江边码头找到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把俘虏营食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给了“捞黄鱼”的水手，被藏进船舱离开了九江。这时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

共中央在两年前已迁往中央苏区。刘鼎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就去找原在中央特科工作、以后调到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绍敦电机公司的“蔡老板”蔡叔厚。蔡叔厚先安排刘鼎在一家旅店住下，其后就把他介绍给美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她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经常掩护、营救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她把刘鼎带到愚园路1305弄4号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新西兰籍朋友路易·艾黎家里。艾黎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情中国革命，他一直把他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时和他同住的还有英国共产党党员甘普霖，管理着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刘鼎躲藏在艾黎家将近一年，尽管环境险恶，但在艾黎积极支持下，还继续不停地进行革命活动。艾黎在其回忆录《艾黎自传》里说：“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尼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

甘普霖的电台一直与中国工农红军通报，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时，艾黎和史沫特莱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刘鼎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其后，一次为了防避可能出现的搜查，艾黎曾将刘鼎送到宋庆龄家里躲藏了三天。

刘鼎在艾黎家里一直住到1936年初，期间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张学良原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闻知后，认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是好事，应当给予帮助。想起还在艾黎家里的刘鼎，是一位颇有学问，阅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她便让史沫特莱从中沟通。刘鼎经过认真考虑，这年3月与李杜见面商谈后，同意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往西安晤张。李杜遂致电张学良：“你要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立即派他的高级参谋赵毅前来迎接。

刘鼎临走，艾黎、史沫特莱等捐献了不少珍贵礼物，托他带给红军。又把宋庆龄写给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信托他带交，还请刘鼎将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医生马海德带往陕北苏区。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刘鼎在西安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接待，他在这里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的赞赏。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病逝后，9月2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刘鼎同志生平》中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的评价：“1936年3月，刘鼎同志赴西安，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系统地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将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刘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谈，随后被任命为我党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将军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央对刘鼎同志当时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刘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外国学习科学技术的党员之一，以后成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他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精力，从事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刘鼎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顽强地度过了曲折坎坷的一生，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谢世后，人们看到在他的卧室案头，摆着一张发黄了的剪报卡片，上面写着周恩来的话：“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刘鼎和周恩来都是这样“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的老实人。

（责任编辑 方 徨）

解除囚禁后的余生

——《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完)

● 徐庆全 赵 杰

1947年2月27日,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井上温泉四周的警戒人数突然增加,戒备也森然起来。虽然与外界隔绝,他还是觉得可能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了。

张学良的感觉没有错。第二天,震惊台湾和大陆的"二·二八起义"爆发了。

三天之后,负责看管的刘乙光接到保密局的电令,即刻准备将张学良解回内地,关到江西兴国县阳明洞。刘乙光立即依命而行,收拾行装,打包装车。上路的准备还没做完,保密局又传来电文,要求做好在台"长期管束"张学良的准备。以往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电台,每周只向南京方面通报一两次情况。值此非常时期,毛人凤规定,每天通报三次,遇紧急情况则随时呼叫。令刘乙光惊骇的不止于此,毛人凤还传达了蒋介石的"圣谕",务必不使张学良乘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将其击毙。

刘乙光即做好应急的准备,一旦张学良越狱或有人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于混乱中打死,然后对上面报告是"乱民"前来劫狱时所为。

尽管机关算尽,蒋介石的心计还是被张学良掌握了,那是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他的。那几天张学良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的话,自己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思来想去,都是极不情愿的。万幸,事变很快平息。

5月,远离尘嚣的新竹山中,流泉淙淙,山花烂漫。"二·二八"前后那段不愉快的日日夜夜,已伴随早春二月的春寒,掩息在葱郁的山峦中。调整了心绪的张学良,已逐渐适应周围环境。正当他将自己的苦闷释放在捧卷研读明史时,国民政府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来了。这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个渡海前来看望他的人。

莫德惠,字柳忱,是奉系的元老,张学良视其为父执。张作霖对其很是赏识,1926年让他任奉天财政厅长,并曾代理省长。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时,他因同车而致使腿上受伤。抗战期间,莫德惠身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并投入了对东北难民和东北军眷属的救济工作,自张学良被"管束"后,他一直在为其获释而奔走。张学良最初幽禁奉化溪口,心情十分烦躁,莫德惠得到蒋介石核准,赶至山上,泪花闪烁,动情宽慰。

莫德惠第二次探访,是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关心张学良的人发动了恢复其自由的活动,东北军旧部也希望他能早日重返军中。莫德惠面陈蒋介石,获准赴桐梓探望。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张学良从莫德惠口中得知,蒋介石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蒋介石让莫德惠转告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是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拍发的不抵抗电报;三是恢复自由后要出国定居。张学良听后,沉思良久,默然无语。这三个条件自己是断然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恢复自由成了泡影。张学良本想直叙衷肠,戴笠派的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寸步不离,所以心里的话只好咽压到肚里。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两星期,两人只能谈家常与读书心得,绝口不谈政治。有一次散步时,莫德惠悄悄问张学良,几时可以重获自由。张学良说估计有两种时机他可以出来:一为对日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时;一为国

民大会召开,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但这两种估计都落了空。莫德惠来桐梓时,带来蒋介石送给张学良一块怀表。张学良接过表幽默地说:“时间已不短了,这块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他也将下野留洋时于瑞士买的菲利浦牌金表,请莫德惠转送给蒋介石,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当释放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一次信用”。莫德惠知其寓意,便风趣地说:“自有佳期,君莫问。”结果,佳期未到,张学良反倒成了井上温泉的幽居人。

莫德惠此次来台湾,成了他在张学良被幽禁之后的第三次探访。

张学良对莫德吐露心境时谈到,自己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教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甚至想有机会效仿朱熹和王阳明,设坛讲学,培养弟子……张学良对莫德惠说:“我读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

莫德惠从张学良的谈话中,感到眼前的张学良已非昨日的心态。当他下野出国归来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拥护。张学良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同以前的少帅相比,现在的张学良简直判若两人。

莫德惠辞行时,张学良以一首《柳老渡台来书》五言诗相赠。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自台湾归来后,心绪难平,总觉得应该将张学良的情况公诸于众,令世人对其行踪和心态有所了解,才不虚此行。于是,他提供情况和照片,由攻玉写了篇《张学良在台湾》的文章。是年6月,此文发表在由上海艺文书局发行的《艺文画报》第1卷第12期。

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以后,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刊出,这时世人才得知他已幽居台湾。但该文不可能真实披露出他在井上温泉的生活境况。网球场上合影中的微笑,遮掩着他难言的心态。

不久,张治中又来到井上温泉。

西安事变之后,张治中曾探访过张学良两次。

第一次是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暂时被安顿在宋子文的公馆。适时虽然对张学良尚未审判,但张治中已从蒋介石《对张杨之训话》中,感到了潜藏的杀机,不禁为之担心。虽然他正在苏州秘密研究京沪区抗日战争计划,但获悉张学良已到南京,便驱车来探望。匆匆分手时,张学良还痴情地提到:“打日本鬼子,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好好准备不可。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形势危急,我也非早日回去不可。请文白兄向委员长转达我的要求,早作决定。”

张治中第二次探访张学良,是在1938年。他从淞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当时张学良正移禁在沅陵凤凰山。张治中赴湘西视察并部署抗战准备后,专程到凤凰山探望。叙谈中张学良说:“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只要我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务必请向委员长转达我的意思。”他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当即伏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参加抗日战争,托张治中代转。

屈指算来,张治中与张学良离别已近十年。

事先得到通报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已在院中等候了。相携进入客厅落座后,张治中对张学良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大,政府内外都有很多人在为你的自由奔走呼吁,蒋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接着又向张学良介绍了国内各方面的动态,讲述了国共两党从谈判桌到战场的较量。

张学良不无伤感地问道:“我何时能恢复自由?”

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国共两党终究是要恢复和谈的。依我之见,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脸上浮现出笑意。他从张治中的谈话中,看到了自己获得自由的另一条途径。

张学良拜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转达两点要求:“第一点,我希望能够恢复自由。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11年。为了让人放心,恢复自由以后,我哪里也不去,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蒋先生可以先考察我一个时期后再

说。”

“第二点嘛，”张学良抬眼看看窗外，压低了声音说，“我希望刘乙光一家从这儿搬出去。他带着家眷，孩子又吵又闹，使人感到很不安静，又不方便。他名为照料我的生活，实际上干涉我的地方很多。他搬出去，我的生活自己可以管理，起码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这两点，请文白兄一定转达到。”

张治中向张学良保证，一定如实地转达给蒋委员长。临行张学良赠诗作别。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依依惜别时，张学良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动情地说：“你这次来，我实在是万分感动。从今一别，又不知何日能再重逢。”两人相对黯然。

张治中归回不久，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两人在井上温泉的合影。一并见诸报端的，还有张学良的亲笔诗稿。

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为代总统。李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谈，中共亦立即表示了谈判的诚意，同时，要求释放张、杨二将军。李宗仁为了做出国共再次和谈的姿态，就职的第二天，发布代总统文告，文告正视中共这一要求，答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随后，李宗仁接连给参谋总长顾祝同，还有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发电报，命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为将此事落到实处，李宗仁派遣得力助手程思远直飞台湾，作为代总统的代表，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商议释放张学良之事。

陈诚面有难色，他深知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张学良，耿耿于怀。为了表示对代总统的尊重，他托词有关张学良的幽禁一事，一向统归军统局管理，只听命于委员长一人，别人实是无法过问为由，委婉地搪塞过去了。

当时，日本的《每日新闻》正连续刊载一篇报告文学，其序言竟是出自张学良之手。在蒋介石看来，不经批准就公开发表文章，这不仅是“越轨”行为，而且是无视“管束”。他即刻下令，赶快查清事情的原委。

原来，张学良接到旧友从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稿。此稿作者萧承恩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参加了对日的情报工作，他将这一段的工作情况写成回忆录，并定名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作者在书中不仅回忆了对日情报工作中的秘密，而且叙述了在江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的经历。

萧承恩原本就与张学良相熟，敬重他抗日御侮的精神，于是将手搞辗转寄到台湾，企盼张学良审阅，并为之亲笔作序。

张学良审读后，将自己的意见写到回信中，表示可以以此代序。在信中，张学良不改初衷，仍旧认为当时面对外敌入侵，“全民抗战”不失为上策。中共“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是正确的”，“应付侵略者的手法是高妙的”，并胸襟坦荡地明言，中共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不临阵脱逃，不高竖白旗，自始至终担任了实际的救亡工作”。

东京《每日新闻》抢先连载了这部书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和关注，读者争相传阅。尽管萧承恩有所防护，但张学良以信代序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就被台湾当局查悉。

台湾当局查清成书的经过后，马上责成国民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通过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进行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政府，自然不敢违抗，《每日新闻》只得无可奈何地中断连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中文版，也分别受到了查封和查禁。

《孤岛野火》风波后，蒋介石下令：外界寄给张学良的物品，不经检查不许交给本人；张学良寄出的信件，必须严加检查之后才能发出。

不久，蒋介石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他的儿子蒋经国也担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开始掌管“总统府”的“机要室资料组”。这个组是党政特务机构的总指挥所，其下设“保安处”，实际上等于取代“中统”和“保密局”的情报工作。自然，对张学良的“管束”，也交由蒋经国负责。

说起来，蒋经国和张学良还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得以从苏联回国，还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给他提供了机会。现在，蒋经国接手“管束”，便自然而然把张学良视为朋友了。为了便于“管束”，也为了以示关心，他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学良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场所。因为此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官邸已确定在阳明山下的士林镇，所以，蒋经国就将张学良的住所确定在阳明

山上。

1954 年，春归阳明山，繁花似锦时节，坐落在山脚下的“士林官邸”的主人蒋介石，出人意料地约见了张学良。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的应变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定居夏威夷

自幼就聪颖过人的张学良，马上明白了蒋介石约见的目的。他说：“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

张学良多年来压在心底的抑郁，还没来得及倾吐，两人的叙谈很快就结束了。

张学良素来明敏坚定，主张做事正大光明，开诚布公，无负于理，无负于人。尽管对西安事变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有难言之隐，既然应允了蒋介石的要求，掩着心灵伤口的创痛，还是潜下心来，伏案疾书。

蒋介石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加入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但苦于资料不足无法行文。他想通过引用张学良提供的资料，借以说明共产党曾插手这一事变，而且张学良轻易受到共产党的欺骗，因而才促成了事变的产生。可当他看过张学良写成的材料后，大失所望，不禁恼火地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蒋的打算落空了，但张学良在事变后第一次亲笔写下了长文，仅就史料而言，可视为当事人直言了历史的真实。蒋介石在叹服张学良的文笔和墨迹大有长进之后，也认为这份材料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于是他下令可以印发给国民党高层圈子内参阅。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父子分外看重这份材料，指出“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处理，可是却在报刊上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发表了。张学良读后大吃一惊。他写出的材料不但被妄加了“忏悔录”字样的标题，而且文中某些关键之处，已被人有所用心地“润饰”过。

张学良委婉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内称：《自述》若视为张学良的忏悔，将它公诸于世，我自当无话。但写成“忏悔录”，又署名张学良，惟恐蒋公以为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发表。请蒋公能拨冗予以明察。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相机运用”的指示，竟被公诸于世，张学良的非议言词自在情理之中。他恼怒之余，当即把蒋经国找来责问，下令有关部门从速查处。

查清事情原委，蒋经国对涉嫌者严加查办，使张学良含怨的《忏悔录》，总算告一段落。至于他所著的全文中，是否还包含其他重要内容，则不得而知。还有究竟哪些地方被做了“润色”，于是招致了所刊文章真伪之争，那都是后话了。不过，仅就摘要来看，不失为血性男儿的剖心之作，无疑为研究西安事变的真相，体察张学良的心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1956 年，在举行西安事变 20 周年座谈会上，张学良的老朋友、时任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语调深沉地说：“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

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他是千古功臣。”

但是，自由离张学良依然距离遥远。在转过年的10月份，“总统府”在操持蒋介石70大寿。很注重友情的张学良，为了表示敬重，也为了试探蒋介石的心态，他要送礼，礼物是张学良精心选择的一块怀表。

蒋介石收到礼物后，当然明白张学良的用意。他也以礼物相赠，送给张的是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见到手杖后，张学良明白了：年事不饶人，身体日渐衰弱，应多多保重，经常散步，自由也便在其中了。

这无言的回复，又一次令张学良陷人绝望。

但是，当蒋介石的手杖伴随张学良倘佯的脚步经历了两番寒暑后，1959年，蒋介石终于恢复了张学良的自由。解除监禁后，张学良又一次迁居了住所，他在北投复兴三路70号选定了住址。在蒋经国的帮助下，新居很快建好，8月，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迁入新居。

自此以后，张学良的住所便人来人往，亲朋好友多次来探望，他在美国的女儿、女婿也飞台相聚。

1990年6月1日，台湾由张群领衔发起，各政要参加的为张学良将军公开庆贺九秩大寿在这里举行。

大厅内红底金字的“寿”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琳琅满目之中，还有张群书写的条幅：“长寿健康，福寿无疆。”

张学良在致谢词中说：“虽然我是年迈了，但是假若上帝有意旨，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定尽我的力量。我能做到的地方，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张的话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总统府资政”孙运璇应邀致词，引导张氏夫妇信教的周联华牧师带领大家祷告。祷告毕，宴会进入高潮，由张氏夫妇亲手分切两座九层高的生日蛋糕，分送到各位客人的餐盘中，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与致谢祝福声。……

知情人还知道，为张学良的九秩寿辰，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张学良的老部下吕正操都有贺电。

邓颖超的贺电是：

汉卿先生如晤：

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民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必欣然而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问候你的夫人赵女士。

邓颖超

1990年5月30日

6月1日，吕正操发来贺电并赋诗一首：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暇：

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

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是日，赵一荻撰写《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文，称：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自己所作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人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与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

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

6月6日，在沈阳由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学良研究基金会、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沈阳校友会、东大在美校友会等八团体发起，于辽宁大厦隆重庆贺张学良90大寿。大会通过致张学良将军祝寿电。

1991年春，传出消息，张学良即将飞往美国探亲。

张学良的亲属几乎都在美国。元配夫人于凤至从1940年赴美，一直没回国，以91岁高龄逝世。张学良和于凤至生有三男一女，三男相继去世，女儿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在美国。张学良同赵一荻生的一子张闾琳也在美国，其妻陈淑贞为粤军将领陈济棠之女。张学良成行的目的地是旧金山，成行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与子女团聚。

3月10日，张学良乘坐的“华航”班机飞抵旧金山。

张学良这次到美国探亲，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多次婉言拒绝了一些研究机构和教会邀请公开演讲、口述历史等活动。但4月7日上午11时，他却令人意外地出现在纽约的播恩堂，参加了华人教会举行的主日礼拜。

张学良这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缘由是自己的虔诚。如果说对此人们还没充分理解的话，那么第二天，即4月8日，张学良在纽约近郊一家私人住宅内，接见了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生，这倒是颇为耐人寻味了。

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的创始地。在此之前为了保存一套完整的近代、现代历史人物的口述资料，曾经对李宗仁、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等人进行过口述史料的采访。来自台湾的张之丙很久以前就仰慕这位西安兵谏的英雄，只是无缘相见，此次她自然不会放弃当面言及想法的机会。

不知这次接触是否使张学良产生了什么想法，人们不曾知晓详情，但有一点后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1996年10月22日，张学良将一生珍藏的文献手稿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图书馆。

这些文献手稿除张学良一直珍藏的善本图书与孤本图书外，还有他当年研究明史，以及研读《圣经》时的手记。其中包括日记、照片、字画、书信等等。当日，这些手稿在哥大图书馆的“毅荻书斋”展出。“毅荻书斋”是取张学良的号“毅庵”与其夫人赵一荻的名字组成的。展览室共有6个窗柜：东北老家、西安事变、在大陆被软禁时期、研究明史及近代史心得、基督神学研究心得以及重获自由之后的手迹。每个窗柜都是以照片或张学良的手迹为主。

据知情人透露，张学良并同意与哥大签署一项“口述历史”的合同。双方曾订有君子协定，他把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全部交给哥大，但规定6年之后，即他预定的身后日以后，才能对外公开。此后的5年间，张之丙教授携助手飞返美国与台北之间，全力投入了对张学良口述史料的整理。

人们预料，世人所关注的西安事变第一手史料，以及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将在口述史料中公诸于世。但那时已是事先约定的2002年，即张学良虚龄102岁之时。这个年纪，使人想起了张群作古后张学良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定与张群一样，争取活到102岁。”适时，倘若他依然健在，珍贵的口述史料还会愿意公诸于世吗？

1991年6月26日晚，旧金山时间晚8时，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抵台北。1992年8月13日上午，92岁高龄的张学良因感冒并发气管炎，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

台湾《联合报》的记者康程川闻风而至。采访简直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接问到出院后是否将安排返回大陆的行程。此一话题事出有因。上年12月15日，张学良在台北教堂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我要在适当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我父母的坟墓，看看我的亲友，这事与政治无关。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不要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张学良既然流露出这一意愿，自然人们对他的行程就会格外关心。

现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学良很有经验地直避锋芒，他摇摇头说：“我没有带助听器，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很抱歉。”赵一荻在一边急忙打圆

场帮腔，接过话题反问说："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你看他这样子怎么去？"

主治医师可能是为了解除赵一荻的疑虑，他在一旁说："如果张先生想回大陆一游，体能上绝没有问题。"这不合时宜的解释，康程川立刻再次询问："外界都很关切张先生是否计划返大陆看看，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吗？"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听了问话，这回不知如何搪塞了，两人迟疑着没有作答。出现了这一尴尬的局面，记者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大家对张先生是不是返回故乡一游的事情都很敏感。能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出院后，你们会慎重考虑大陆行？"对于记者这一得体的提示，张学良表示认同地点点头。表过态度后，他又看看夫人赵一荻。朝夕相伴的赵一荻从张学良的目光中已明了，这既是征询自己的意见，也是要自己代为作答。于是她回复记者说："好吧！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会在这次出院后，慎重考虑是否回大陆看看。"

就在他们出院第三天，即 8 月 24 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记者康程川的报道："张学良决定近期返乡探亲。"文章开头就作惊人之笔地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幽居台湾长达四十余年的前东北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内偕夫人赵一荻女士由台北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再转乘中国民航回东北辽宁老家，与阔别 56 年的家人、乡亲和旧属作短暂团聚，以了却有生之年最大心愿和怀乡之情。

文中又说，张学良确切返乡日期，将视其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在 8 月底及 9 月初可能成行。

张学良夫妇将回大陆探亲的消息，使人愈加产生了关切之情。张学良的亲朋好友为之兴奋和喜悦之时，纷纷询问有关情况，并盼望早日成行。记者在文中对此也作了渲染：张学良告诉友人，他此次偕夫人赵一荻返乡，完全以一般老兵心情回去探亲、访友、叙旧，决不涉及传达两岸任何信息的事，也不做长期定居大陆的打算。返抵东北老家后的第一个心愿，是前往父亲张作霖坟前拜祭，以了却五十余年来未能亲自扫墓的愧疚。在大陆访问的探亲行程，将由东北亲友代为安排，时间长短完全视身体状况而定，原则上不超过 3 个月，因为 12 月的东北气候太冷。

报道中最后还说，由于张学良历史上的身份和曾起到的作用，有的知近朋友也曾问到此次之行是否还要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张学良一再强调：大陆之行纯为私人探亲活动，希望台湾及大陆媒体不要打扰他。云云。

先后见诸新闻媒介的张学良"探乡"消息，尽管不明"可靠消息来源"，但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出于良好的愿望，未深究其中是否有无臆造之虞，难捺期盼，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扬的"迎亲"准备如潮涌动。

人们正在猜测和翘首企盼的时候，199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时，张学良在北投宅邸接受了大陆 4 名赴台记者的采访。他们一行分别来自 4 个单位——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社。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采访张学良将军的大陆记者。

大陆记者在台湾海基会两位人士的陪同下，走进位于阳明山北投区复兴三路 70 号的张公馆内时，张学良已在书房前欢迎他们。他身着一套灰色长袖夏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夫人赵一荻身穿紫红色碎花短袖旗袍，落落大方，身体看上去很健康。记者团长翟象乾首先上前握住张学良的手，向他表达了大陆人民对他的问候，张学良不断颔首微笑，连声称谢。

大陆记者赴台时，正值张学良身患感冒，虽说曾住院治疗，但还没完全康复。当他得知大陆记者要来访的消息后，欣然应允，这使记者们异常兴奋。赵一荻对记者们说："本来他不舒服，因为你们这么远来，他一定要接待你们。"

众人落座后，张学良便与记者们仿佛久别重逢似的亲切交谈起来。尤其是赵一荻，她显得兴致更高，不断地向大家谈起自己的信仰。

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即身体情况及何时回大陆看看。张学良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痛，是骨刺，一碰就疼，不碰不疼，有时可以走路，有时一步也走不了，一个礼拜做三次物理治疗。他还说，平时看看电视，他的妹妹一个礼拜来一次陪他打打桥牌。他的眼睛不太好，看书看报要用 15 倍的放大镜，6 盏灯照明。他说："你看我桌上放的书，要用很大的放大镜看，看报我就很为

难了。你在这地方,人是看见了,可是谁我可看不清。我在美国做了检查,说是老化了,没法子,别忘了我是90多岁了,92岁了，是1901年生的,现在我要戴助听器呢。”

问及风传他10月将回东北的报道，张学良说,自己并不清楚,“他们给我安排的。”

记者问起他的饮食和起居时，他说:“我们两人的生活很简单,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

当记者问:“两岸大多数人都想统一，您老人家有何看法?”张学良说:“那是大多数,我也是大多数之一。”

记者又问:“您对和平统一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的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记者问:“您对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说:“我祝这个成功就是了。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回答:“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很不错。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记者谈到,大陆人民非常关心他们,去年北京播出一系列关于少帅的电视剧,形成了“张学良热”。张学良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都把我们戏剧化了。”赵一荻则在一旁说,不必看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张学良表示，他知道大陆近年的巨大变化，“希望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我这个人是好动的。”

谈到家乡人民关心他时，张学良表示:“当然知道,我的家我是经常挂念的,台湾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国。可是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老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他还要诸位记者返回大陆后,问候关心他的大陆亲友,并感谢有意安排他返乡的所有亲朋好友。

大陆记者送给张学良一根手杖和一本大陆风光画册,那根手杖上情意深厚地刻着100个寿字。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并把赵一荻有关《圣经》著作赠送给记者。赵一荻介绍了张学良研究神学的情况,并拿出他翻译的《相约在骷髅地》给大家看。张学良向大陆记者透露说,“曾显华”是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最后，记者请张学良向大陆青年说几句话。他也没拒绝，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他们好好做人做事。我是基督徒,我很希望他们有信仰。个人不要活得飘飘荡荡的,像浮萍一样,总要有一个信仰。我并不是说一定都要做基督徒,我这个人不是这样想。有个信仰自己才能定位,尤其是年轻人。”

在这段采访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感到他当年的风姿依稀可辨,浓重的乡音一丝未改。他与记者交谈中,始终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极为热诚。大陆记者觉得他“就如父执辈一样亲切”。

40分钟的采访结束了。张学良先生一再说:“谢谢大陆人民关心我们,祝福他们!”合影留念时,记者从侧面看到,张学良的眼圈发红,眼眶里噙着泪花。

楼外夕阳西斜。张学良拖着病腿,坚持要送记者们出门。走在最后的是《参考消息》报社的端木来娣，她回身握住张学良的手说:“不要送了,您休息吧!”张学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一阵才放开。他又向前走了两步,依依不舍地站在门口张望。回首望去,一行人的心里都是酸酸的。

采访中,大陆记者一再向张学良表达大陆人民的关怀和思念之情，以至台湾新闻媒体认为,这次采访“其实是‘问候’的性质高于‘采访’的意味”。

1993年12月15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飞往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此后,张学良一直住在夏威夷,直到2001年去世。(全文完)

(责任编辑　仲　文)

牟作云梦系五环旗

● 李玲修

出身于河北武清县农民家庭的牟作云，从小学就喜欢运动。1928 年，他考入北平育英中学，第二年就参加了全市运动会，获得了跳高、跳远、三级跳三项冠军。初三时，他入选校篮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得了冠军。高中二年级，牟作云又代表北平市参加华北中学生运动会，得了三级跳、标枪、跳远三项冠军，个人总分第一名，标枪成绩还打破了全国纪录。由于田径基础十分优秀，牟作云考入国立师范大学（北师大前身）体育系，成为校篮球队前锋，很快又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优秀选手。1936 年，柏林举办 11 届奥运会，牟作云无可争议地入选了。

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经费预算是 22 万法币，政府只拨给了 17 万，其余的要靠体育协进会四处化缘。不足部分还要靠球王李惠堂的足球队先期出访东南亚赚取一些门票收入补齐。为了节约开支，69 名运动员只配一名随队医生。

1936 年 4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田径队、篮球队在清华大学强化训练两个月，由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担任总教练。

在马约翰教授大运动量的强化训练下，两个月就打破了 9 项全国纪录。

集训期满到上海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做出国准备。哪知一些运动员在假期中被上海的款爷请去寻欢作乐去了，到出发时，有些运动员萎靡不振，气得马约翰捶胸顿足："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东亚病夫'的帽子还想戴多久?!"

这件事给牟作云印象很深，他叮嘱自己要抵御社会恶劣环境，全身心投入事业。

6 月 26 日中国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轮"康梯罗梭"号从上海启程。

近一月的行程，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到柏林后，精神都未调整过来便仓促上阵。

结果与代表团事先估计大相径庭，只有符保卢的撑杆跳进入了决赛，但技术未发挥好，未取得名次，而足球队首场对英国就输了。

篮球队抽签结果是首战日本、次战法国、秘鲁、巴西，按当时各队实力，中国队完全可能冲进前 6 名。

当时留德华侨和留学生及驻德大使都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地，要求首场必须胜日本队。教练董守义住进了医院，哪知这样的赛前施加压力给队员造成严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一紧张，技术发挥不会正常，加之无教练临场指导，结果以 19:35 惨败日本。

虽开局不利，但 8 月 8 日，仍小胜法国队，比分是 45:38。8 月 9 日，战秘鲁队又 21:29 输了。10 日，与巴西的交战，中国队已毫无斗志，以 14:32 惨败。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军覆没！

更惨的是中国队被淘汰后，没钱回国，只能留在奥运村看别人比赛，等闭幕式。

闭幕式结束后，运动员必须离村。牟作云他们因为没有回国旅费，只能撤到柏林一个极简陋的小旅馆里去等钱。使大家愤愤不平的是，团长王正廷根本没到柏林来，带队的官员闭幕式后竟带夫人到美国旅游一番后飞回国内！

后来，还是靠使馆内工作人员募捐了一部分钱，李惠堂等人又拿出来一部分旅费，才得以买了车、船票原路返回。

当时的沮丧心情就别提了，七尺男儿的牟作云和伙伴们，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满腹除了

屈辱感还是屈辱感，牟作云痛心疾首地想：中国体育什么时候才能在世界之林崛起？……

厄运并未到此结束，第11届奥运会一结束，希特勒就撕下伪装进攻波兰，不久中国也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后，同学们四分五散。

家境贫寒的牟作云在大学读书时曾半工半读，在育英中学兼课外老师，事变后书没法念了，他就去了育英中学教体育。

日本伪政权成立后，拟举办一个“中日满亲善运动会”，用来装饰门面。听说牟作云是篮球“五虎将”之一，参加过奥运会，就派人拉他参加代表团去东京。牟作云当即拒绝。

牟作云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便化装成一个阔少爷，穿着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坐头等车厢逃到了天津。在租界同学家住了一天，又乘船到了上海。本想继续去后方，但囊中羞涩，就住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宿舍里。

这时他才得知，他离开育英中学的当晚，日本宪兵队就来抓他。在旧中国，体育带给他的不仅是屈辱，还有杀身之祸……

牟作云逃亡到上海后，手中的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马约翰教授。马教授不仅在奥运会代表团集训时接触过牟作云，而且是他就读的国立师范大学的兼职体育教授，给他上过一年多体育课。马约翰对青年人的爱心给牟作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向马教授求援。

这时，北大等校成立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于是他就给马约翰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马约翰果然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牟作云来后方。这样牟作云从上海乘船辗转路过香港、越南河内才到了昆明。

马约翰热情地接待他，安排他当体育老师。后又让他到国立师范大学继续念完体育系，以便拿到毕业文凭。毕业后联大正式聘牟作云为体育老师，从此他成了马约翰的得力助手。

当时西南联大校舍简陋，体育设施什么也没有。教授们全住乡村，每天步行很远来上课。马约翰一如既往地坚持学生必须上满四年体育课，成绩及格才可以毕业。他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徒手操、军事操练、跳障碍物、爬墙等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以便为民族救亡冲锋陷阵。

牟作云担任的课程很重，每天五六节课，但他教课一丝不苟，所以马约翰很喜欢这个有强烈上进心的年轻人，做什么事总让牟作云当主力，牟作云都做得很出色。他虚心好学，经常登门向马约翰请教，几乎每周都要到马约翰家开会，研究帮助昆明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计划。时间一长，他和马约翰家的人全都很熟悉了。

马约翰的二女儿马佩伦，是云南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教员，性格热情开朗，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她和牟作云常一起出去参加体育活动、看电影……后来两人就不愿再离开了。

牟作云夫妇和作者（右）

1944 年 4 月，牟作云和马佩伦举行了婚礼，牟作云成了马约翰的爱婿兼助手，这使中年失掉长子和长女的马约翰夫妇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而牟作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耳濡目染马约翰的学识风范。抗战胜利后，马约翰推荐牟作云去他的母校——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习。

在这篮球发源地，牟作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体育行政、体育统计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员健康检查与治疗等课程；主修了初级篮球、中级篮球、高级篮球的训练理论，为将来振兴祖国篮球事业拼命武装自己。牟作云在美国还有机会观摩了世界一流的篮球比赛，使他不仅学习了美国篮球教学方法，也了解了篮球队的训练方法，大大开阔了视野。

正当牟作云在春田拿到学士学位向硕士学位努力时，国内因准备参加 1948 年奥运会而催他火速归国担任篮球队教练，为雪柏林奥运会奇耻，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国。

不想等待牟作云的却是厄运，他回国才知道篮球队教练已换了别人。马约翰看到被自己召回的爱婿报国无门，毅然辞去代表团总教练，以抗议当局不顾国家荣誉出尔反尔的行径！

北平解放了，牟作云见到不少体育工作者去问马约翰：“共产党还要不要体育？”

马约翰十分坚定地回答：“当然要，体育不可能取消！”

事实很快验证了马约翰的预见：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体育，而且要像抓其他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一样抓出名堂来。

建国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从清华走上革命道路的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去拜访老师马约翰，请牟作云出任联欢节中国代表团篮球队的领队兼教练，马约翰爽快地答应了。

牟作云从京津抽调 8 名学生组队，在青年联欢节打了个第 6 名。

1952 年 7 月 17 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邀请新中国参加第 15 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议，荣高棠接到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兰凯尔的邀请电时，距奥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没有集训，没有时间做充分准备，这样仓促上阵能赛出好成绩吗？如果篮球队重蹈 1936 年奥运会惨败的覆辙，自己又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牟作云思来想去，觉得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这张迟到的邀请真是出了道难题，不仅是体育难题，还有政治难题，因为他们同时也对台湾发出了邀请……

基于这些考虑，本来在会议上大部分人倾向放弃这届奥运会，荣高棠将报告打了上去，周总理却批示“要去。”

军令如山倒，牟作云火速调兵遣将，选拔好篮球队人马，自己夜以继日地投入了训练。

7 月 23 日深夜，牟作云在荣高棠带领下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恩来指示。周恩来说：“关于你们担心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据我看，现在他们尚未到达，也就不一定去了。即使想去，你们走北路也会比他们先到。总之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的三架伊尔—14 型小飞机，7 月 24 日凌晨 5 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已是 29 日上午 11 时。

中午，在奥运村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对牟作云来说，更有一种感染力，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到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五星红旗，对准这庄严的仪式，对准致欢迎词的组委会副主席马托拉将军，对准中国体育代表团 40 人的队伍……在此时，牟作云才进一步理解了周恩来的政治眼光。

果然，台湾当局得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进村，取消了参加此届奥运会的计划。

遗憾的是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太晚，错过了足球、篮球的预赛，只有吴传玉第二天可以赶上仰泳预赛。预赛游出了 1 分 12 秒 3 的成绩。虽然没取得决赛权，但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

看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取得了与世界体育大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好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敬羡之余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新中国的体育怎样迎头赶上去?!

40 年后，北京奥申委代表团 200 多人乘专

机飞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 101 次全会将在这里召开，会上将投票选定 2000 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此时已 80 岁高龄的牟作云作为奥申委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随团乘专机飞上万里云空。

望着窗外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代表团里李宁、邓亚萍、李小双、伏明霞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欢声笑语，饱经沧桑的牟作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要一鼓作气地申办 2000 年奥运会了，是不是在做梦？

这的确是个梦，这个梦中国人做了近一个世纪。1932 年，第 10 届奥运会上，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1936 年第 11 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全军覆没，但留下了牟作云这些立志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火种。1952 年中国终于争取到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后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奥委会里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国不得不于 1958 年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和 8 个国际体育组织……

1979 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又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1980 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委讨论通过的三名候选人中排在第二名的就是牟作云。

牟作云所以能获此殊荣，是与他对新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

解放初期，他带的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打破最轻量级世界挺举纪录的陈镜开和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郑凤荣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56 年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的牟作云，为振兴祖国篮球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球类司制订了国家篮球竞赛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他还投入大力气抓全国甲乙级教练员培训工作。每个甲乙队的年度训练计划，他都亲自过目，检查该队训练大方向对不对。他还提出教练员升级时必须写一篇对篮球训练的体会与设想，作为评选等级的根据。与此同时，牟作云还把统计学运用到训练比赛中，如全国甲级联赛，抢篮板球抢多少次？投篮命中率多少？罚球命中率多少？……既有统计又有分析，注重训练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一套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训练方法对中国篮球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篮球队逐渐超越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和菲律宾队，而且还曾战胜欧洲强队。

牟作云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出访过 40 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球队，也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谊。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我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时，曾经获亚洲篮球冠军的菲律宾队来华比赛，结果输给了中国队。随后牟作云又率团回访，马科斯总统在总统体育馆里邀请牟作云与他打壁球，通过广播实况，在菲律宾引起广泛良好的影响。

翌年，牟作云率篮球队访问日本时，曾得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见。1978 年，牟作云率队访问了美国的 5 个城市，在华盛顿两场比赛都赢了对手，在纽约也打得不分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官方给予球队很高的礼遇：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亲切地接见了球队；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字样的笔赠送给牟作云，称他们是继乒乓外交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

牟作云退休了，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世界只有 6 人获此殊荣），亚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

在蒙特卡洛举行的中国申奥新闻发布会上，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特向各国记者介绍了牟作云：“这次来的还有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牟作云先生，他是我国篮球宿将，曾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 这时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牟作云的镜头。

投票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当听萨马兰奇主席说出了“悉尼……”时，牟作云惊愕万分，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牟作云甚至想到，也许他今生会留下一个巨大遗憾：不会见到在自己祖国举办奥运会！没想到 7 年后的 2001 年，中国申奥就取得了成功！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 李学通

在中华民国史上，1929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可是，这一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乃至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却有着极可纪念的日子。就在1929年即将结束的12月2日，年轻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奉献到世人面前。这就是后来被方毅副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而就在“北京人”头骨面世的20天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赵亚曾，正在从事地质调查时在云南被土匪枪杀于客栈。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震惊了中国及世界科学界，人们又惊奇地发现，这两件事竟然发生在同一个机构——地质调查所。

与民国相始终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地质调查所这个名字了，但是在70年前，它却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科学机构，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曾是多少欲献身科学的青年梦寐以求的圣地。从1913年9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12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到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消失，它走过了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发展历史。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清朝末年，西方一些学者、探险家和工程师不断来华进行地质考察、探险及采矿工作，带来了近代地质科学知识，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也开始接触学习地质科学，但是政府设专门机构从事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则恰恰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著名实业家张謇任总长的实业部的矿政司下设立了地质科，担任科长的是留日回国学生章鸿钊。

章鸿钊字演群，江苏吴兴人，生于1877年，1905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地质学开山鼻祖小藤文次郎学习地质学，1911年回国后，初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春，章鸿钊南下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组建了地质科并任科长。章鸿钊纵观时势，提出了“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树实利，以免首事之困；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的中国地质科学发展方针。他的所谓“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就是主张成立地质调查（局）所，以为开展中国地质工作的基本。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成立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开展地质暨国土资源的调查。正当章鸿钊踌躇满志，准备一展鸿图之时，动荡的政局打断了他的梦想。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身为工商部地质科长的章鸿钊因工作得不到支持，遂借故转赴农林部任职，设立地质调查所之事不了了之。于是又引出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另一位奠基者——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生于1887年，整整比章鸿钊小10岁。丁文江少时聪颖，被人赞为神童。他先是赴日留学，后又转赴英国，考入剑桥大学，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毕业回国。1913年2月，正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丁文江，应邀赴京接任地质科长职务。到京不

久，他便上呈《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陈述地质调查在发展实业中的重要性和应处的优先地位，即刻开展地质调查的具体方案。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决定成立一个学校性质的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以三年为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人才；同时将原地质科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从事实地调查工作。这两个地质所的所长都由丁文江担任。

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后，由于人才缺乏，实际工作进展不大。直到 1916 年 7 月，人称“十八罗汉”的 18 名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加入，地质调查所才真正开始全面的地质调查工作。1920 年 7 月，地质调查所由矿政司改归农商部直辖，名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此后，地质调查所便一直是部直属机构。

1921 年丁文江辞职后，所长一职便由中国地质学第三位奠基人翁文灏代理。1926 年翁正式出任所长，并一直当到 1938 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928 年 6 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对旧北京政府机构接收裁并之初，将地质调查所划归国民政府大学院。由于地质调查所并非纯学术研究机构，而与经济建设紧密相关，最后还是由农矿部接收，名为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30 年 12 月，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后，地质调查所也随之改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地质调查所已经以其辉煌的科学成就赢得国内外科学界极高赞誉，实际已成为全国地质调查和地学研究的中心。它的英译名是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即中国国家（立）地质调查所。

1935 年底，地质调查所南迁南京，在北平原址设分所。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地质调查所被迫西迁重庆。1938 年经济部成立以后，地质调查所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地质调查所先后由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尹赞勋和李春昱主持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地质调查所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1949 年国民党溃败之时，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即将来临的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根据国家科学事业及经济建设需要，1950 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与艰难相伴随

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序幕，可是大幕拉开后却没有可以上台的“演员”，所长丁文江几乎是个光杆司令。1913 年冬天，与他同往调查正（定）太（原）铁路沿线地质状况的，仅有一位聘请的德国地质学家。1914 年初他赴云南及川黔边界调查西南地质及矿产时，只得独身前往了。为培养人才而成立的地质研究所，甚至连一位愿意且能够担任专职教授的人都找不到。

正在难以为继之时，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婉拒了出任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高薪聘请，加入了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行列。虽然薪水每月只有 60 元，但翁文灏表示“这种工作很合我的素志”。章鸿钊形容翁文灏的加入，使这一事业“如鼎之有足，不虞覆餗”，各种工作“得以循序渐进”。

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毕业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原主要担任教学工作的章鸿钊、翁文灏等，也将全部精力转入地质调查工作，人才缺乏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当时军阀统治，争权夺利，混战不休，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如走马灯般更迭不断，根本无人真心思虑国家建设、科学发展。地质调查所每年经费预算是 6.8 万元，实际只能领到 4.2 万元。而全所职员每年的工资一项已占去 3 万元，这其中还包括聘外国顾问和派人赴国外进修的全部费用。剩下的 1.2 万元便是全部科研经费，包括购买图书仪器，出版书籍刊物的费用。就是这样的标准，也还常常是欠薪，经费折扣发放，职员们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当局害怕丘八们哗变闹事，四处借债发饷，却没人操心科学家是否会饿死，科学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地质调查所最初每年都要派 8 个人分上下两期赴野外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出者每人经费为 1000 元。余下的 4000 元经费中，用于印刷专业刊物的约 3000 元，其余的一切开支都要在剩下的 1000 元内解决。为此地质调查所尽一切可能压

缩开支，非专业人员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庶务，两个人一年的薪水不过200元。所长翁文灏连个秘书也没有，所里一切来往书信、公函都由他自己动手，每天写信写得手腕疼。

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丁文江、翁文灏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先是得到开滦、中兴等六大煤矿联合捐助，以5年为期，每年2万元。与此同时，地质调查所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在科研经费方面逐渐有了改观。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原只有三间平房，仅够存书。1919年丁文江借随梁启超赴欧之机，广泛搜罗欧美出版的各种地质图籍一万数千册，但图书馆"室隘莫容"，一直没开包。地质调查所原有的五间矿产陈列馆也早已不敷使用，许多标本只能在箱子里放着。于是丁文江、翁文灏等又发起向国内各大矿商募捐活动，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在内，许多人都捐了款，共募得银币近4万元。除五分之二用于购置图书外，其余用作新馆建筑。1922年9月，利用社会捐款，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盖起一座新式二层楼房的图书馆，并扩充了丰盛胡同3号的地质陈列馆。

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派员北上接收，地质调查所却愈发困难。最初地质调查所连专门经费预算都没有，只是由农矿部从办公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大约仅千余元。翁文灏为此专程赴京，四处求告，最后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同意与农矿部共同负担地

翁文灏

质调查所的经费，才使地质调查所勉强维持下来。可是只过了一年，到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也因经费紧张，停止了对地质调查所的补助。地质调查所于是转而与北平研究院协商合作办法。自1930年3月起，地质调查所同时兼有了"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的名义，经费由双方负担。

其实，对那些矢志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来说，工资低、科研经费缺乏都不算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靠搞科学研究发财，他们也已经把自己物质生活的标准降得很低，他们只想着能以自己的才智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做更大的贡献。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率有关人员冒着不断的余震，亲赴震区调查。翁文灏一行风餐露宿，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得了营养缺乏症。

一次，翁文灏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招聘启事，了解到赵亚曾想要离开地质调查所，找一份收入多一点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为了留住难得的人才，翁文灏借口自己事忙，将商务印书馆请其审稿的工作让赵亚曾等几个年轻人来做，使他们有些额外收入补贴家用。其实他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八个子女，也是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留下了赵亚曾的心，却没能留下赵亚曾的命。如本文开始所提及的，1929年11月15日，赵亚曾被土匪杀害，以身殉职。赵亚曾1923年自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考入地质调查所，在师友们的帮助下迅速脱颖而出，6年中共发表论文专著18种，100多万字，显示了天才地质学家的素质，被丁文江、翁文灏等寄予厚望。翁文灏称他"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仅师长惊异，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更进逼长城，占领热河，威胁平津。正如翁文灏所说，"在此不啻处于炮火前线，精神上激刺甚深，无法安心工作"。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防意外事件突发，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将部分重要图书、标本紧急南运，以防万一。为求长久之计，原本不愿到南京的翁文灏，也不得不为迁址之事四处奔波。南迁不到两年，全面抗战爆发，地质所再次西迁，科学工作遇到了重大挫折。1937年北平沦陷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

被日军占领，工作陷于停顿。尤其惨痛的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至今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仅如此，1944 年 4 月，再次发生了地质调查所科学家遇匪被害的惨剧。著名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青年地质学家陈康（地质调查所技佐）、马以思（女，地质调查所练习员）在广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

抗战胜利后，历经磨难的地质调查所又回到了南京，期待和平建设的科学家们，碰到的依然是时局不稳，物价飞涨。正像杨钟健说的那样，“一切恢复工作进行得非常之慢，正常的研究工作更加不易推动”。全面内战爆发，地质调查所未能很好地开展科学工作，科学家们盼望着新时代的来临。

与伟业相辉映

自 1916 年全面开始工作之时，章、丁、翁三人就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订下了“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和科学研究“期符科学之标准，而免为空疏之浮文”的高标准。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努力，数年之中地质调查所就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所长丁文江却不急于办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和报告，惟恐达不到国际先进标准而有损新生的中国科学界的名誉。正是这样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界有了一个高标准和高起点。1922 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出席了第 13 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散发了地质调查所近年出版的成果，内容涉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和地震地质学等重要领域。国际地质科学界惊奇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从最深的地层中冒出来了，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科学界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诞生的。例如，翁文灏的“燕山运动”发现，黄汲清的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谢家荣对玉门石油地质的首次调查，中国矿产地质研究以及白云鄂博、攀枝花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中国第一幅用现代科学方法编制的地质图，中国最早的地震科考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被誉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的中国地图集，中国第一个土壤调查与研究机构，云南禄丰恐龙的发现，中国人最早对三峡大坝的地质考察，等等。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的 30 年间，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成为 1949 年以后新中国地质事业辉煌成就的坚实基础。

与这些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同时为中国地质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被胡适称为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人，就是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后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后来他们又分布到各个科学机构，例如叶良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谢家荣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李学清任过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庭祜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捷、周赞衡长期任地质调查所技正，谭锡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技正；还有黄汲清、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1949 年以前，地质调查所有丁文江、翁文灏、叶良辅、谢家荣四人先后被举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俞建章和李春昱等 10 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领域有 6 人，其中 4 位来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其余两位是李四光、朱家骅）。1949 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 47 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位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个科学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心中仍不免有许多感慨、许多自豪和许多苦涩。

（责任编辑　庄建平）

巴金的爱情与婚姻

● 明 红

50 年前，巴金、萧珊与他们的子女

巴金是四川成都人。他于 1904 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

1936 年，巴金在大上海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的书信，追求他的人很多，来信中，有一女生写的信最多，言词却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来到新雅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学生就像熟人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女孩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女孩望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想像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像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女孩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把我当小孩看哟。” 这个女孩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珊，这名字是 1941 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相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地叫她“小三”，待她写文章发表时，于是就以“萧珊”的谐音为笔名了。

萧珊告诉巴金，她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妈妈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她不满爸爸的约束，想离家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 17 岁的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还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感情真挚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

“新雅”见面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大作家和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1936 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

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做一个小朋友对待。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的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侮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

有主见了,成熟了,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的真情,同时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抗日烽火突起后,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都投入到战地医院工作,萧珊也参加了,她常把战地医院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巴金,巴金则鼓励她写文章。萧珊写的第一篇作品《在复兴医院》,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烽火》上。巴金表扬她文笔美,萧珊受到鼓励,又写了许多篇,《烽火》、《宇宙风》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作品。萧珊的行动,鼓舞了巴金,他以萧珊本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为素材,写了宣传抗战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萧珊。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 年 7 月,萧珊高中毕业,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

1938 年 10 月 18 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1939 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相约定第二年再相见。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 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回来又伏案写作。

1942 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挚爱,使巴金感动不已，他颤抖地说:“萧珊，再等我一年,好吗?”

“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的大哥自杀后,留下一大家人,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 年 5 月 1 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星期后,他们旅行抵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当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买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瓶葡萄酒。小天地里虽然清贫幽寂,但有温馨的晚风和清新的红花绿草,还有悦耳的溪水声作伴。他们沉浸在微弱的灯光下和绵绵的絮语中,他们从没有这样呆在一起过,也没有享受过一次这样的温馨,他们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深情地诉说:我们多么需要爱得天长地久啊!

建国以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地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次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 年 7 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必须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惟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

1972 年 8 月 13 日中午,巴金一生唯一挚爱的爱妻萧珊溘然长逝。

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不时沉浸在与萧珊共同生活的美好岁月……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著作。

（责任编辑　刘　文）

孙道临在《渡江侦察记》中饰演的李连长

儒雅君子孙道临

● 宫洁民

在当代影界来说，孙道临是德艺双馨之冠。他虽然已是八十大几的长者，但他乐于奉献，一直在为中国电影事业奔波。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不夜城》那年，有一件事很值得敬佩。影片刚一开机，有位姑娘每天站在电影局门口等着要见孙道临。电影局有关人士耐心规劝不起作用，后来白杨出面才把那位姑娘劝走。自此以后，大伙就誉称孙道临是“儒雅君子”。

孙道临出生于老北京一家书香门第，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同窗好友黄宗江的影响，逐渐走上电影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大团圆》、《乌鸦与麻雀》、《民主青年进行曲》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建国后，参加多部影片拍摄。他在《不夜城》中饰演的资本家，民族特色鲜明，上镜头时角色到位；在《革命家庭》中饰演的江海清，刚强、忠诚；在《渡江侦察记》中饰演的李连长，英勇、机智；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的李侠，坚毅、敏锐；在《早春二月》中饰演的萧涧秋，又是那样彷徨而后觉醒。他所扮的角色性格，都是那么鲜明。

孙道临不仅拍电影出众，为译制片配音同样出色。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50年代，上海厂译制《王子复仇记》时，他为王子的配音，非常成功。根据王子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恰当地运用音调、音强、音高和音律，配出音来，浑厚、含蓄、声洪气足。这部译制片播放时，产生了最佳效应。

孙道临结婚较晚。他的友人总是常常说起他和越剧演员王文娟的那段姻缘。王文娟是浙江嵊县人，13岁到浙江省学唱绍兴文戏，因聪明好学，很快挑起头肩花旦的重任。50年代，由她主演的《春香传》、《红楼梦》、《追鱼》是越剧的里程碑。她一心演戏，到50年代末，年过30还未婚配。孙道临迷恋越剧，几乎被越剧醉倒，只要有空闲，就去观看王文娟主演的剧目。有一次，孙道临直率地去找黄宗江和黄宗英兄妹，说自己年近40，要他们帮助物色对象。黄宗江听了满口答应，用京剧道白回答说：“算来只有越剧团王文娟还待字闺中，不知你意下如何？如合得来，这大媒我包下来了。”很巧，孙道临的心事又被另一位热心人观察出来，她就是孙道临的同事张瑞芳。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60年代初，两位大龄男女喜结良缘。婚后生活得十分美满，在上海电影界传为佳话。

80年代，孙道临夫妇虽然都已年近古稀，但艺术创作一直不停。不久，夫妇二人携手合作，把越剧《孟丽君》移植到荧屏。这部由王文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在上海首播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许。更值得称道的是，不久前，孙道临又为执导一部影片《詹天佑》倾尽心血。这部人称“铁路之父”的新片，引起中央领导和影界名家的热情赞扬。

（责任编辑　刘　文）

蒋劲华的手撕『书法』

● 傅宁军

黄山的奇峰、奇石、奇云、奇松，已风传天下，可黄山还有一奇，却鲜为人知，你听说过手撕“书法”吗？就是用两只手撕字。那撕出来的字挺漂亮，可以跟毛笔书法比美。

撕字的奇人叫蒋劲华。30来岁，说是奇人，形象并不奇，一个极普通的中年人。只见他从那堆白纸中随便抽出一张，看都不看就撕起来，颠过来，倒过去，三下五除二地撕掉多余部分，一长串字撕出来了。绝妙的是撕出来的笔锋，居然有毛笔书写的感觉。

他可撕出斗大的行书“龙”字，如同巨笔挥墨而出，一气呵成。撕出的小字，如袖珍的楷体。中国的方块汉字，似乎融入了他的生命。在他舞动的手指间，一瞬便是活生生、热腾腾、赋予了充满着阳光般朝气的形象。

蒋劲华老家在安徽黟县，那是个以古民居列入世界遗产的皖南山区。父亲出生在书香门第，对于书法十分喜爱。蒋劲华出生于1960年，从他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逼他学着用毛笔。临摹字帖是他每天的课外作业，在枯燥的重复中磨砺着他的韧性。

1976年，16岁的蒋劲华到黟县龙江乡插队。在农村，他用不着读书了，时间也都给了农活，他却感到了毛笔的亲切，不愿意把点滴的时间浪费掉。就连在田头劳动休息，他也会找根树枝，在地上划着方块字的笔划。正是有空就想着练字，给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后来，蒋劲华当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他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让孩子们羡慕不已，很快在全乡都有了名气。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鼓舞了下乡知青，1979年，19岁的蒋劲华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师大生物系。在宁静的校园里，他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理科和文科的各门知识都如饥似渴，不光对自己的专业课抓得紧，他还选修古典文学，对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蒋劲华的知识面越发开阔，书法也日见成熟。在安徽师大的学生书法比赛中，他夺得了一等奖。一个理科学生拿到了一个书法大奖，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社会正走向开放，书法艺术也面临着求新求变的呼声。

蒋劲华的才华，被正在酝酿发展的黄山旅游部门看中，他进了黄山市徽州区旅游局，仍然耕耘着他的书法天地。他的积蓄，几乎都用来购买民间的古代书法的珍品。他近年多方收集，已经拥有了16卷唐宋以来历代书法家的尺牍，时常揣摩，百看不厌。他说，中国书法是神奇的，给了他难以言说的熏陶。连故乡的那黑瓦白墙，砖雕漏窗，木雕造型，还有那厅堂里的对联，古典文化的意韵无不渗透到他心里。

蒋劲华的书法作品，曾入选《二十世纪书法家鉴赏集》，并曾被毛泽东纪念馆收藏。中国书法协会主编的《世界华人书画作品精选》，也选中了他的一幅行书。他完全可以这样地写下去，把已有的名气发扬光大，他却成天揣摩着突破，对于每个方块字，他在心里装了拆，拆了装，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练习手撕“书法”，与其说是在撕，不如说仍在写，是毛笔的延伸。

在一次电视晚会上，蒋劲华作为电视台的特邀嘉宾，现场表演了撕字，而且一边撕，一边与主持人周涛说着话，叫现场的观众大开眼界。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许多大型晚会的周涛，虽然见多识广，仍然十分感慨地说：“只看到过有人写字，真没见过有人撕字，不简单！”

蒋劲华的绝活儿，首推手撕“书法”，他还能写空心字，而且可以两只手同时写。如一副对联，两句不同的话，居然也能一只手写一条。蒋劲华如今的最大愿望，是用2000张16开的白纸，拼成1000平方米的大块面，用手撕出一个大大的“龙”字，这肯定可以入围“吉尼斯世界大全”，成为一个“撕字之最”。（责任编辑 刘 文）

学风三昧

● 郭毅生

少年时读《苏曼殊诗文集》,初识“三昧”这个词,朦胧而直觉地感到它意味着“真谛”、“要诀”或“精义”。后来方知这是梵文 Samādhi 的音译,是唐代佛门高僧玄奘法师在翻译天竺佛经时,创造了这个既谐音又会意的、切贴绝妙的汉文词语。至于“学风”与“文风”,它是指学术界特定历史时期的风尚。风尚无形,但它却有力量。

谈学风,首先应该提倡的是“好学”之风。在东方,机杼声和弦诵之声,创造了汉、唐帝国的璀璨文明。中华民族的儿女,不仅有聪明的才分,而且勤勉好学。人所共知,家世寒微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好学敏求”、“入太庙、每事问”,读《易》经至苇编三绝的读书人的范例;唐太宗以武功被尊为“天可汗”,但他勤勉好学,深通经世治国之道;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首,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几乎达到沉迷不返的程度。据传,他一次在归途中发现一块字体遒健的古碑,便立在那里观摩欣赏,驻足不行。随从者报知家中,他夫人说道:“快抱床被褥,带把伞去吧,他是不回家了。”果然,欧阳公在那碑前呆了三宿才归家。这事虽未必真如此,但却描绘出了一个求学致知者的可喜的情态。清初以弓马骑射定天下,但这个勃兴于白山黑水的民族,好学成风,人才辈出。他们培育了纳兰性德这样的卓越诗人,也给《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遇。清朝的十个皇帝,在文化修养上远非明朝君主所能企及。例如康熙大帝玄烨,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他下令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他研究水利以治黄河,探讨音乐以资教化。他读书之勤奋和爱好,令人惊讶:大暑天,他让侍讲大学士轮流休息,但自己每天从来不辍学习。

当然,好学求知也是苦差事。被推崇为诗仙的李白,是从老妪将铁杵磨成针的事例中得到下苦功的启发。当代范文澜先生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作学问如钻探石油,3000 米下是油层,如果钻到 2900 米停止,那就是“功亏一篑”了。诗人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鼓励奋进者。桃花源式的境界,多半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最后一程。

第二是提倡学术上的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凡属上乘的著作,多在于它论证了一个开创性的命题,或解破了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某个奥秘。教育家培养人才,着重在培养其创造性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鼓励他的独立见解。一位名人在自述中写道:“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人,要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就有要人不依傍门户,不躺在前人树荫下乘凉的意思。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治学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试想,如果思想囿于某种先入为主之见,或拘泥于固定的框架,不能跳出其藩篱,岂不是死海无波、浊水一潭么!

学术与政治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以得票多少决定取舍。但学术问题的是与非,却不能靠举手表决。哥白尼是地球绕日学说的首创者,在当时,人们蒙昧不能理解,罗马教廷更认为他违背教旨,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但他的学说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顾炎武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大学者,他的著名论文《论苏、松五

府田赋之重》,以充足的资料证明:元、明以来三百多年江南太湖地区“赋重于天下”。他这个名篇为太平天国在苏、浙实行“减免钱粮”、为李鸿章奏请“减租减赋”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像哥白尼和顾炎武等大学者,他们的主张与学说,开始支持者都是少数,但他们却是先知先觉者。所以,在政治上要尊重多数,在科学上却要尊重少数。

学风中的第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疑应该是树立正直不阿的风骨。学风中的正气,是学者们高贵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形成的。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浩然赋流形”,当是指此而言。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说道:“才、学、识,得一不易,兼三尤难。”的确,饱学有识的人并不多。但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人物却不够,还应该有“德”作为准绳。因此,他在该书中,又立“文德”和“史德”两篇,作专题论述。什么是“文德”呢?他提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原则,并说“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换言之,文德是包涵在尊重(“敬”)和宽容(“恕”)之中的。然而,当今有些人却自以为天下第一,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成果,也没有养成宽容的美德。这既违悖于中国传统的恕道,更与西方民主主义精神相去万里。关于“史德”,章氏阐释得也很到位。他说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好的人撰述的史书,难保不偏私和有违客观的真实。前些时曾拜读一篇论中国史学传统的大作,该文宣扬了中国史学有敬业求真、考证详明、不畏权势等诸多优点。至于有什么弱点和缺点,却未置论,这难免使人憾然。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二十四史,横看竖看,每行每页都写着“吃人”二字。然而在史官的笔下,统治者多半成了圣君贤相,唱赞歌和粉饰太平之词,从政坛传染到史坛,满篇皆是。所以,看历史单凭两只眼睛是不够的。数年前在拙著一篇文中写道:“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董狐的铁骨铮铮,知者较多。至于魏收其人,却有待介绍。原来他是南北朝时北魏的史官,其人贪墨成性,借撰史敛钱。每立一传,索贿数百千两不等。不少人争着给他送钱,求他给其翁其祖写传,好扬名千古。试问这样的史传有何真实可言呢?

学术要敢于坚持真理。在这方面,已故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记得在十年动乱中,他应邀审看“评法批儒”的预展。他在孔子和秦始皇的大画像前,伫立多时,并逐字逐句审阅了解说词。然后他对陪同的该馆领导说道:“历史博物馆要将历史的真实告诉人民大众,这是职责。孔子是儒家的老祖宗,他的学说几经流变,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教育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解说词要全面介绍,好与坏,正确和错误都恰当指出来;秦始皇的解说词中,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但对他的过错却没有提,这很不恰当。你们是否改写得全面些为好。”这一席话,在当时极左统治的重压下,可谓金声玉振。

中国近代遭受列强的侵略,迫使青年学人弃科举仕途,负笈万里,远涉重洋去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求教。先是容闳率30个“童男童女”去美国,他们中便出现了詹天佑、徐寿和华蘅芳等一批报效祖国的工程大师和学者。清末国势垂危,为爱国救亡,神州大地掀起了巨大的留学浪潮,著名的同盟会员吴玉章兄弟俩,是变卖家产来筹措旅费和学费的。“五·四”运动后,又出现新一波留学潮。在英、法首都伦敦、巴黎和德国的柏林、汉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便不难看到中国莘莘学子的身影。与留学并行的是,在中国国内已陆续开办新式学堂,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便创设于1898年戊戌维新之际。北大在蔡元培时期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特色。那时,辜鸿铭长袍辫子登台讲伦理,李大钊夹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讲义阐扬共产主义,胡适则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和杜威实验主义吸引学生。有人颇为形象地说:“北京大学虽然门坎高,可进去了却自由发展”,在当时确乎如此。北大学风优良还在于它顺乎自然,不扭曲、不压抑个性发展,因而它的成才率高,多有出类拔萃的学者在其间。20世纪40年代,一个初进红楼,来到民主广场的学生,便会感觉到一种清新自由的空气。它会洗濯你脑子里封建意识的尘埃,使你在人文主义气氛的熏陶下,觉悟到个人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从精神奴隶中解放出来。人的思想解放,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文艺复兴创造了欧洲的文明,便是例证。

(责任编辑　洛　松)

头等战犯、大法学家王世杰

● 傅国涌

1948年12月25日的中国,虽然硝烟未熄,但胜负已定,江山唾手可得的共产党宣布了头等战犯的名单,共计43人,王世杰名列第22位。什么是“头等战犯”,就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如果不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介绍了他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我们恐怕连王世杰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过。

几十年来,“头等战犯”的定性掩盖了王世杰作为一个法学家的成就,以及他对法的精神的呼唤。

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长期留学欧洲,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就为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写特约通讯,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还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讨论工会权限等问题的文章,提出工人有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及团体契约权,但工会不得干涉工人不罢工等观点。

从1920年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1921年开始担任系主任,后来一度兼任教务长,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中国奴婢制度史》等,其中《比较宪法》已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分为消极的基本权利(即个人自由)和积极的基本权利。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居住及迁徙自由、工作自由、意见自由、通信秘密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并享有财产权。后者又称受益权,也就是人民获受于国家的利益。如最低限度的教育权利,弱者得受国家救恤的权利,劳工阶级得受国家特别保护的权利等;明确公民有选举权和直接立法权,坚决否认任何形式的贵族制度,认为一切公共职位,除了规定智识的及道德的资格,不应有其它任何限制,提出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人民平等原则。书中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也进行了详细讨论,还认真探讨了合议制、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独裁制等多种政体之间的不同。

《比较宪法》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到1947年已增订七版,是1949年前再版率最高、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宪法学著作,在我国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王世杰曾担任多年武汉大学校长。鉴于他在法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1948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虽然那时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王世杰完全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

1924年12月,以王世杰等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立足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为原则,以兼容并包,独立、宽容、开放的办刊态度,能容纳不同的政治、文化倾向,是一本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同人刊物。注重发现并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还破例给过当时无名的北大学生王实味30元稿费。

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警察曾多次没收、查封刊物,《现代评论》曾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王世杰则发表过《警治与法治》一文,提出“言论、集会、结社,这三种自由,人人都承认是民治主义的条件。”“法治制度的精神,积极的说就是,人民仅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后,须依法律受审判法庭之制裁。消极的说就是,人民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前,不受警察之任何干涉;人民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后,也不受警察的直接处分。”他对法律精神的维护完全是以正义为前提的,他以法学家的身份大声疾呼废止《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管理新闻营业规则》这些恶法。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惩治盗匪法》,律师施洋、工人领袖刘华等就不至于以“盗匪”名义被军阀所杀。“强有力的军阀,虽不必凭借什么法律,才能蹂躏小百姓的生命、财产与自由,而恶法律的存在,对于他们毕竟也是为虎添翼,授

盗以刀,毕竟也可以增加小百姓的厄运。”这样正义凛然、为民请命、直接为共产党人说话的文字竟出自一个“头等战犯”之手。

《现代评论》还发表了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惨剧》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直截了当地说出“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当他(凶杀案制造者)站在政治舞台上面的时候,纵能逃脱法律与法庭的制裁,当他下台以后,却不能保障不能同他算账。”“目前最要紧的手续,便是收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

1927年,与他们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军阀残酷杀害,《现代评论》编者愤怒地写了《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短评。虽然送审时被抽掉了,但目录中仍保留了这个题目。

透过王世杰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法的精神的大力张扬,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自由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他们只不过凭着自己的良知独立发言,而没有依附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让后人最难以置信的是,《现代评论》甚至发表过不少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等。从1924年到1928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现代评论》树立了一座多元文化的活的丰碑。

作为一位喝过西方现代文明乳汁的学者,王世杰当然力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主持教育部期间,曾向行政院会议提交过《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提案》,并修正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10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逐渐达到四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等种种因素,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他还签署了第一个由政府正式公布的《简体字表(第一批)》,但不到半年,就奉“行政院令”宣布“应暂缓推行”而夭折了。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世杰以书生从政,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要职,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庆谈判时,他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亲手签署过著名的“双十协定”(即《国共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还是他起的。据周恩来说,重庆谈判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王世杰在“政治会议”中间加了两个字——“协商”。双方接受了这个说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虽然那次会议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政治协商”这个名称却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曾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过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卖国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9月2日,他参加了历史性的日本受降仪式,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他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赔款问题“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

1949年,他在台湾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因触怒蒋而被免职,一度重操旧业,在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当了几年教授。1959年,他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胡适去世后,他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70年4月辞职。

(责任编辑 刘 文)

王世杰(左)与司徒雷登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 孙代尧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

改造时期的国民党，曾一度提出以工农及知识分子为党的社会基础。此后随着岛内政经环境的快速变迁，国民党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考量出发，不再强调政党的阶级属性或只代表某些阶级。1957年国民党八全大会修改党章，强调只要接受中国民族主义号召的社会力量都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70年代初蒋经国主政后，为了使国民党适应一个已经多元化的社会，更加强调“党必须以群众为基础，为根本，为重心”，要“向下扎根”，“开拓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大力推动国民党的“本土化”、年轻化和专业化政策，为国民党补充台籍党员新血液。这些措施使国民党的省籍比例和社会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75年，台籍党员人数已超过五成（占52.82%）。1952年，在国民党员中，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占80%，到198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到三成，而工商界企业家和公务人员的比例有较大提升。一些大资本家还进入到党的核心机构，例如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台泥董事长辜振甫、太子汽车集团董事长许胜发、统一企业的高清愿等。

在1950年7月通过的国民党改造纲要中，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即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只讲集中而无民主，如中央委员的产生，全部由党的总裁或主席提名，全会代表走过场般如数鼓掌通过。到80年代，“民主集中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党内政治精英的质疑和挑战，国民党不可避免地开始“党内民主”的内在转化。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首先开放了60%的党代表，由“党内初选”或党员代表大会方式选出，打破了过去由党的干部提名的垄断，提高了党员在党内政治参与的分量。中央委员的产生，除一半由党主席提名外，另一半则开放自由连署参选。不过，中常委的产生仍由主席提名、全体中央委员鼓掌无异议通过的传统形式；而主席的产生也同样沿袭中常委推举、全体中央委员起立鼓掌通过的传统方式。

国民党内的权力交替、省籍结构及理念上的冲突与矛盾，形式上都是以“党内民主”的名义为诉求，说明党内组织和决策方式不断地在遭到重大挑战，因而导致执政党陷入分化甚至分裂的危机。其实，一个长期垄断执政的政党，即便不能很快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可以首先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可惜国民党直到丧失执政地位后才做到这一点。2000年6月，国民党“十五大”的“临时大会”通过国民党改造案及党章修订案，在主席连战的领导下开始了国民党退台后的第二次全面改造。这次改造终于涉及到落实制度层面的党内民主，主要包括实行党主席直选制和改进提名制度。2001年3月24日举行了国民党历史上首次党主席直选，连战以97%的得票率当选。新的提名制度规定国民党参加各项公职选举的提名人，应经过党内的初选，由党员投票及民意调查各占50%来决定，以充分结合党意与民意。这项制度在2001年底第5届“立法委员”选举和第14届县市长选举中开始实行。此次改造国民党重新定位为“全民民主政党”，党的

"革命"属性终于消失不见了。从国民党在台湾由盛至衰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会因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也都有其特殊的生命循环。

国民党真正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是在创党30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下进行了国民党的第一次改造。应当说,这次以苏共为范本的改造相当成功,不仅健全了党的组织体系,而且为随后建立的苏联式"党国"体制奠定了基础。1925年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即规定了政府在党的指导及监督下掌理全国政务,政府的施政方针、政府部门重要人事均由党决定。此种党政关系体现了孙中山强调的"军政时期"实行"以党建国"、"训政时期"则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南京国民党政府正是在"以党治国"或"以党训政"的名义下行"以党代政"之实,实行一党专政。

与第一次改造很类似,国民党退台后的党改造也是以早年的苏共为蓝本,而改造后建立的政权体制也具有明显的"党国"体制特征。不过,与大陆时期相比,党政关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从"以党训政"变成了"以党领政"。

"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在1951年2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中就作了规定。1.在县市以上各级"民意机关",设立由党籍"议员"组成的"议会党团",凡是党员者均须在"议会"中发挥党团作用。2.在县市以上各级行政机关,设立"从政党员政治小组",以求贯彻执行上级政策。3.党、政、"民意"机关的协调,在"中央"级方面,1952年的"七大"后,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置"党政关系会议"(1955年后改为"中央政策委员会");在地方级方面,直到乡镇级都设由党、政、"民意"机关主要党员组成的"政治综合小组",以发挥工作上协调统一的作用。

与国民党在大陆极权统治时期的"以党代政"相比较,在党政关系上变得比较制度化。如从省、县、乡三级地方党政关系来看,政治综合小组有关施政计划、年度预算、地方性政策等措施,及"民意机关"有关地方建设的提案,事前要经过政治综合小组协调审议;各级政治综合小组的决议,应报请主管党部核定后,由主管党部督导"议会党团"发动议员完成立法手续,或督导政治综合小组贯彻执行。换言之,从程序上看,党的决议是通过政府机关或"议会"中的党员,依照法定程序,而变成政策或法令,并由从政党员加以贯彻执行。党政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并非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得比较"自律"了,关键在于已经举办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地方选举,对党政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要求比较高。由于有地方选举,国民党不易像在大陆时期那样完全垄断政治社会,它不得不依"法律"形式推行某些政策,以取得选民支持,而保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各种选举中顺利当选。

国民党在台湾"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从6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基本趋势是党组织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52年国民党改造结束后,此前一度松弛涣散的党组织系统得到健全和巩固,渗透力也大为增强,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行政部门不单设党的领导系统,而由各级行政主管同时兼任同级党务系统的主管。这种制度设计使行政官僚部门有相当的决策自由。事实也显示,隐形于行政部门内的党组织,除了选举动员或政策协调外,在行政事务方面"以党干政"、"以党代政"的情况很少出现,整个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本上都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手中,因此党的决策功能不断在下降。以蒋经国时代为例,中常会每星期三上午开会,通常党主席在作完简短发言后,由某一中常委作报告,一般是通报行政官僚送到中常会审议的政策或法案,时间约20分钟。报告完后,常委们很少讨论或进行辩论,在主席做一些指示后,大家鼓掌,会议即告结束。实际上,党与行政官僚的关系不再是"以党领政",反而是党在替行政官僚排除障碍,使其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蒋经国开始主政的1972年,国民党"十大"通过的党务革新案,正式明确了"党政分工"的原则。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当年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通过"现阶段党务革新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党政分际"的原则。在一党体制下,实行党政分开这无疑是政治体制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执政党本身民主转型的要件。国民党虽然克服了这一挑战,但最终出现政权旁落,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中国历史上官妓及其它

● 官伟勋

中国最早的国营妓院应是春秋初期齐国的“女闾”。

《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韩非子》《抱朴子》也有关于齐国首都临淄设国营妓院的记载。

一闾就是二十五户。七百闾是一万七千五百户，这些数字都是相当大的。

战国时的临淄能有多大？会有那么多妓女？请看苏秦的描述：

“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摩肩接踵，其繁华热闹程度简直像如今的北京王府井一样！

中国娼妓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三皇”；有说起源于“夏末”，多属传说。

史家认为，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娼妓皆源于“宗教卖淫”或“神圣卖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卖淫“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中国在殷商时期也有类似宗教卖淫的，即所谓的“巫娼”，但官办的，有可靠记载的应是齐国女闾。

汉朝“国营妓院”有新发展。分宫妓（专供天子娱乐的）；官妓（专供官员娱乐的）；营妓，专供军队的。汉武帝开疆扩土，征战频繁，为巩固部队提高士气，设“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唐朝是官妓鼎盛期，宋人《东京梦华录》说当时汴梁遍地都是妓馆，“凡京师妓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向晚灯烛辉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集于主廊”，“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宋初年陶谷在《蜂巢巷陌》里也说：“今京师鬻色（卖淫）户将及万计。”明朝的教坊组织要比唐宋时期逊色得多，还规定，官妓别报丁口税赋，其夫必须戴绿头巾，着绿腰带，穿猪皮鞋。教坊官还要代表国家向妓女收取“胭脂税”。清朝是私娼为主的时期。

管仲公开设妓院增加国库收入，不仅当时“国人非之”，后人也多有指责。明礼部尚书于慎行批评说：“管子治齐，设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此在王政视之，口不忍道，即后世言利之臣，亦未当榷算至此者，此可鄙亦甚矣！”

“照吃窑子”不误。于慎行又说，“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税及此等者，如临清之差役，通州之饩程，多取诸此。”“不但有司，乃至礼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以从，此最不美之事。”指责归指责，这“可鄙亦甚”的事却一直昌盛不衰。

清朝道光年间，被派去福建漳龙道当道员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写道：“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另外还送给官长的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

家人张淦问张集馨：“这笔款怎么处理好？论理，扔出去才是。可现在各镇、府、营、县，都认

为是应得的。一旦裁掉这笔收入，会招致怨恨！”张集馨说：“这种款，绝对不能收，怎能忍心用这种钱呢？”张淦说：“我收到多日了，心里也觉得不安。听说前任徐道台也不肯收，又不便裁掉，家人便将这笔钱归于伙食费里了，我们是否可以照办呢？”张说：“廉俸为薪，吃起来用起来才心安理得。归入厨房，跟自己用有什么区别？不如发给军功厂，让他们赔补格外糜费吧！”

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而且不乏朝廷高级官吏。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谁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可鄙亦甚”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离管仲之世不远的孔子，不知为什么没有片言只语批评管仲办国营妓院的事。虽然他对管仲家里的设施装修超过标准，有微词，但仍对管仲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老百姓至今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不是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的野人吗？”在孔子眼里，管仲是文明社会的开辟人！

孔子为什么对“女闾”之事未加指责呢？这只有两种解释：或是他不知道齐国有这种事；或是他不拿这种事当回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说不过去的，他自己就吃过齐国妓女的亏。

《孔子世家》说：孔子56岁那年，由大司寇兼任首相，很快就把鲁国治理得国泰民安。作买卖的不敢漫天要价了，不卖假冒伪劣了；男女走路分着走，没人骚扰了；路上掉了东西都没人捡了，哪里还有偷东西的？“邻国之福，本国之祸”。齐国怕了，怕鲁国强盛起来侵吞齐国。齐国的谋士出主意，让齐王给鲁君送去80个服饰美丽能歌善舞的美女。鲁君果然被迷住了，竟连续三天不问政事，疏远了孔子，孔子眼看再呆下去危险，只好罢官自费出国“打工”去了。一路上很是辛苦，风餐露宿，受过困，饿过饭，“累累若丧家之犬”！成天坐木轮大车颠出了胃病，郭沫若考证大约是胃下垂，结果终生“不撤姜食”。

“得于君者不可击”！接近国君的“美女”是惹不得的。官高如宰相、学问如孔夫子者，也不是对手！这些“美女”就是国妓。因此，说孔子不知道齐国有国营妓院的事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了：那个时代的孔子，没把这种事看作什么“可鄙亦甚”的丑事。

娼妓现象为什么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历久不衰？西方有许多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比较常见的有：“社会安全阀” 观点、“性冲动释放”观点，皆着眼于减少强奸等性犯罪，维持社会安定之类；“结构功能主义” 论点，认为可补家庭缺陷，维护家庭“完整”；“代罪羔羊”观点，“慰安妇”的设立就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说可以避免性病蔓延削弱战斗力。在二战期间是为了降低占领区的敌对情绪；二战后则为了避免占领军搞混民族血统的“纯洁”等等。中国大约出于儒家传统，一直对这种事羞于启齿，因而缺乏像西方那样公开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命题进行研究。解放初期有人研究过，后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近年来才又有人把这门学科拾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卖淫”这一社会病态，只要私有制还存在，是无法消除的。只有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消失了，“卖淫”才会消失。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但也是相当遥远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扎扎实实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卖淫现象，并最后彻底消灭这种现象。

问题是，在这之前怎么办？我们既不能感情用事，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一相情愿地指望通过几个“战役”就把它彻底铲除；也不能放任自流，让它肆无忌惮地蔓延。

列宁早就说过：“对于卖淫现象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

急于求成想一下子一网打尽，不仅打不尽，还会形成反反复复地“捉放曹”。大规模地抓，大规模地罚，大规模地放。据说1992年抓的是1984年的20倍。如今是多少？不在其位，不谋其数。但从电视上的“扫黄”镜头看：捂着脸，披着发，躬着腰，光着腿，一抓就是一大批，说多年来有增无减，大约不算过分。

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公开地光明正大地进行研究,力求找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办法。与此同时,有必要首先坚决管好党员干部。

问题不会因为不承认它就不存在。越爱面子就越没面子。承认它研究它,想办法解决它,才是科学的求实的态度。封建时代虽说在总体上是把妇女当作玩物的,但许多王朝为了维持其统治,还是严厉禁止官员嫖娼的。元朝有“职官频入茶楼酒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的刑法;明朝则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的规定。西方发达国家高官发生这种事会有什么后果,大家都清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然要有更严格的要求才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执政党与政府的声誉,关系到社会风气走向,更是关系到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卖淫”现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至今没听说哪个国家真正彻底消灭了这种现象。有些人把“沉渣的再泛起”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恶果,这是不正确的。既然这种现象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屡禁不止,就有其自身的某种规律在,因此就要研究它,才能逐步减少其腐蚀作用,保障我们社会更健康更顺利地发展!

(责任编辑 仲 文)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3.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羡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羡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羡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3.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包拯身前身后事	张国华	26.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26.0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之一 六月雪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之二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之三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寄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中国自然保护区探秘	张天来	350.00	12.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是《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的作者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书中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写起,叙述了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中思想界的“交锋”。那些人们所熟知的“华国锋与两个凡是”、“胡耀邦与文章救国”、“邓小平力挽狂澜搞改革”、“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的终结”、“失去邓小平后的中国”、“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以及姓资姓社的争论内幕,在书中尽现。人们能从书中体验到20多年来的变革,甚至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70年党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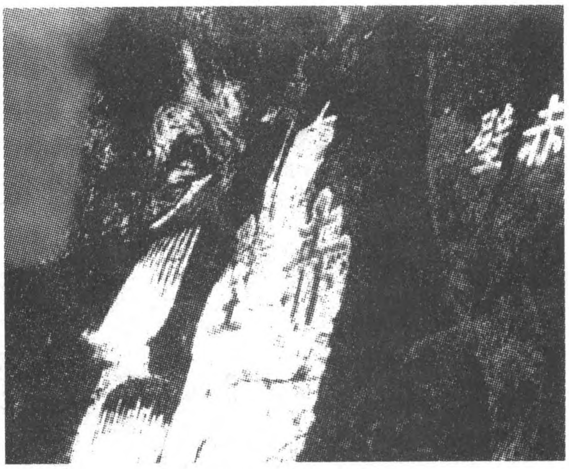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无罪流放》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五七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五七干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我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次特殊遭遇、再生与自我反省的一幕。书中有张光年、吴祖光、屠岸等66位知识分子的亲历告白,它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按封三新址)

赤壁之战中的张昭

● 纪拥军



赤壁之战旧址，湖北蒲圻赤壁

《资治通鉴》详细叙述了赤壁之战前夕孙刘联盟结成的全过程，还特别介绍了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议。作为江东重臣之一的张昭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样劝告孙权：“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然而，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和周瑜的极力主张下，抗曹的孙刘联盟终于结成了，并且孙刘联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使孙刘双方避免了覆亡的命运，三国鼎足的局面得以形成。

由此看来，张昭此次是充当了一个投降分子，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大多数读者甚至历史学家恐怕都是如此看法。

其实未必！

我们不妨先看看张昭是何等人物。张昭，字子布，徐州人。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他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避乱逃到了江东。孙策开始在江东崛起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德高望重、卓有见识的老前辈，就以弟子之礼去拜见他，请他出山相助。孙策短命而死，临终前他把国家大事和他年幼的弟弟托付给张昭。孙策死后，孙权悲痛欲绝，不知所措。张昭就带上人马，陪孙权到各地巡视，以安定人心。从此，他和周瑜一文一武，辅佐孙权，管理江东的内外大政，对稳定江东的局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张昭在孙氏政权内部，甚至在当时的知识界都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据史书记载，狂傲到可以击鼓骂曹的文人祢衡，对张昭都是另眼相看的。

如此一个重量级人物，为什么在孙氏政权濒临危亡的紧急关头，却有如此言论呢？我们还是看看历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的注文中所说的一段话吧：“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乱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功于天下矣。”

裴松之这段话大意是：张昭投奔孙氏，主要是想辅佐他安定百姓，并非要帮助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现在曹操既已扫平北方，平定荆襄，这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那么帮助他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免除生灵涂炭，有何不好呢？

如此说来，赤壁之战前夕的张昭我们就好理解了。我们要知道，鲁肃、周瑜、诸葛亮都是少年得志式的人物，他们是喜欢争斗的。而张昭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他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着眼点，他的愿望，是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千百年的历史证明，只要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频繁的战争首先伤害的是黎民百姓。因此，张昭自然就想到了劝告孙权放弃抵抗，拥护统一了。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张昭的建议被采纳了，中国历史上虽然少了赤壁之战这一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甚至少了英雄辈出、让人说不尽、道不完的三国时代，但老百姓将少受几十年的战乱之苦。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张昭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决不是“挟持私虑”的投降派。

（责任编辑　吴　思）

酷吏与酷刑

——读钱锺书札记

● 舒 展

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刘恒（即汉文帝）为帝，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有人诬告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他在狱中遭到侮辱，体验到监狱狱卒之淫威，钱锺书引周勃本人的话感叹道："吾尝率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管锥编》第1册第303页）

周勃感叹监狱之黑暗，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清朝桐城派领袖人物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于康熙时被株连），在《狱中杂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刑部大牢里的亲眼所见：每天早上总有三四个病死的犯人被拖出去。按照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给人犯打开锁链，因此如果半夜里死了人，活人和死人只有继续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所以得传染病的人很多。牢头、狱卒肆意对被囚禁者欺压凌虐，敲诈勒索，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帮胥役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却完全掌握着囚徒的命运。

封建社会，在判罪之前，解押犯人所用的刑具，通常是桎梏：束缚脚的，叫桎（即脚镣）；束缚手的，叫梏（即手铐）。犯人转移，只能戴枷。秦、汉时将桎梏统称为"械"或"三木"。晋以后称之为枷，从唐至清的各代，法律虽然对枷的尺寸、重量、适用情况都有规定，但封建官吏不断翻新花样，使枷成为一种折磨、迫害人的可怕刑具。宋代有过超重量铁枷，明代有过重达100斤、150斤直至300斤的大枷，还有一枷同锁数人的连枷。清代盛行站笼，这种刑具实际是将枷固定在一个木笼的顶部，犯人站在笼中，颈部被枷卡住，脚又够不着笼底。如果脚下垫几块砖，尚可苟延时日，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毙命。

钱锺书还引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他在狱中阱槛箠楚（遭杖刑），目验身经，所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因"被刑之徒比肩而立，狱吏之深刻残贼，路人皆知"，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为标榜，但在述及监狱黑暗时，他也不敢细说了。

李晚芳在《读史管见》（卷三）中对酷吏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自武帝喜用酷吏，不特四民重足而立，即公卿大夫亦人人自危，百姓不安其生，群臣震慑，宗室侧目，郡中无声，不寒而栗者是已。太史公亲睹其害，不胜叹息痛恨于当时也。故其传酷吏也，既著其威之加于人，即著其害之受于己。想太史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事直书，善恶自见。

司马迁所受的是具有对人格侮辱性质仅次于死刑的宫刑。此刑由来久矣。禹时，中国古代由父系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要求稳定，这时制定宫刑正是适应了客观现实的需要。夏代时，三苗（少数民族）肆行"五虐"，其中有"椓阴"，就是宫刑。夏灭三苗，却将他们的涿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之一。西周时还规定："公族无宫刑"。意思是说，奴隶主贵族犯了罪，不能判处宫刑，原因是为了贵族必须传宗接代，所以他们犯了罪该处以宫刑者，就用"髡"（即剃去头发之后做看守仓库一类的劳役）来代替。这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的历史渊源。西

周时，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奄人”。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阉人。《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寺人、侍人等，也都是指奄人。人被阉割时必须避风寒，否则会断送性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不透光，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似的，故称“蚕室”。百天以后伤口完全愈合，才能到外面自由行动。汉武帝时，不少文武大臣都被处以宫刑，除司马迁之外，还有将军李延年，张汤的儿子张贺等。

我觉得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特色的酷刑，莫过于廷杖。廷杖起自汉代，形成制度则在明朝。明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刘瑾把大学士刘健、谢迁赶出京师，激起士人共怒，给事中（皇上的高级秘书）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21人，联名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同时弹劾刘瑾。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请圣旨，将这21人全部逮捕，各廷杖30。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三次上疏，三次被杖，每次杖30，第三次受杖后过了三天死在狱中。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上疏救戴铣，刘瑾假传圣旨，把他廷杖五十，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把他贬官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以前，朝臣被廷杖都不脱衣。朝臣受杖时还穿着厚棉衣，外面再裹一层毛毡，廷杖仅仅是表示一下惩罚罢了。从刘瑾开始，朝臣受杖时要解衣褪裤，这样就很容易被打死，而且，某朝臣受杖时能否保全性命，要取决于监刑的太监的态度。校尉行刑，既要听监刑太监的口令，也要看他的脸色，还要看他的脚尖。如果他的脚尖向外开成八字形，校尉就下手轻一些，不至于把人打死；如果他的脚尖向内收敛，那么这位受刑者就休想活命了。

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然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置了《酷吏列传》，共10人。诸如宁成、张汤、王温舒、杜周……从此之后，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等都列有《酷吏列传》。

酷吏是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为特点的官吏。例如张汤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是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史记·平准书》）。张汤官职作到御史大夫，他向皇上奏请，廷议中九卿不入言者，即按“腹诽”论，应该处死，就这么轻易剥夺了群臣的“沉默权”。

酷吏并不等于贪官，然而，酷吏当中贪官居多，例如宁成拥有田产千余顷。王温舒死时，家产累计数千金。他还发明“连坐法”：大者灭族，小者处死。王温舒担任河内（即今河南武陟）太守（省级长官）时，郡中被牵连获罪的多达上千家，每次处决罪犯都是血流十几里。天子（汉武帝）闻之“以为能”，故而将他升迁为“中尉”（即首都的卫戍司令）。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本意，我认为张云璈在《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列传》中说得好：“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上既能之，则深文曲法何所不至，虽明知张汤怀诈面欺，仍为案诛三长史以谢之，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此作传之本意也”。《后汉书》（九十）《蔡邕传》中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由此可见，古来的卫道者对司马迁的秉笔直书鲠言风骨是何等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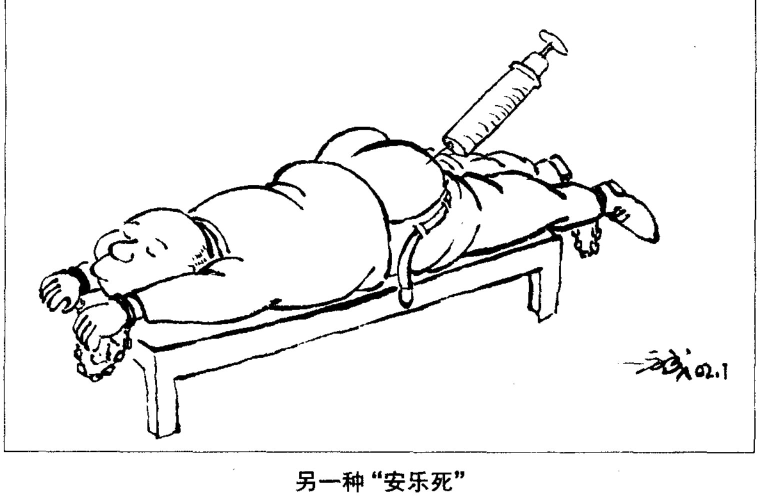
有酷吏，必有酷刑。酷刑并非中国古代所专有。古代希伯来人对犯人处死刑有以石击死、斩首、烧杀、矛刺、毒杀等30种以上。中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规定，煽动暴力者，触犯皇帝利益者，均处死刑；还规定有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刑法，适用死刑的罪在200种以上。但是中国古代的酷刑，却有无比残暴和特别具有独创性的特色；令世界上古代各国酷刑相形见绌。西方有“Chinese Torture”（即“中国酷刑”）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汉高祖时审讯贯高，“鞭笞数千”，被打者全身已经没有好肉可打了（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酷吏宁成做函谷关都尉（掌管该地郡兵，秩比二千石）时，黎民百姓都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酷吏杜周做廷尉（即最高司法长官，列九卿之一）时，奉旨审理案件极多。审问时官吏逼

着受审者承认被告发的罪名，如果不服，就严刑拷打，直到承认为止。近代国民党统治时，有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等等酷刑，不过是对封建专制酷刑的一种继承而已。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就有五刑：墨、劓、剕、宫、大辟。这些在甲骨文中均有记载。到了秦汉之后，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中世纪。五刑到了封建制高度发达的隋唐时就改成了笞、杖、徒、流、死等五种。然而在实行中，封建专制社会的刑罚，却是以虐待罪犯为泄愤、报复、甚至是快乐的享受，其残暴野蛮，在世界刑罚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五刑，仍在继续实施。诸如墨刑，又名黥刑，汉代名将英布，受过黥刑，故又称黥布；北宋时，改用以针刺面，例如《水浒》中林冲被刺配沧州；武松也是受黥刑，是刺在额角上，所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以遮盖被刺的字；劓（音义）刑，即割鼻子，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时，曹操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放火烧毁了袁军的粮草，俘获袁绍的将领淳于仲简，将他的鼻子割掉，还将一千多名被俘斩首的袁军的鼻子都割下来，派降卒送回袁绍大营，将士们见到这一千多只鼻子，无不胆战心寒。

我认为列举历史上死刑的种种残暴方式最能证明封建专制的野蛮、无人性。例如：一、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行刑者必须达到 120 刀以上直到体无余脔，这个刽子手才算合格，然后剖腹断首；此刑又名“寸磔”，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就是以此刑处死的。二、车裂（即五马分尸）——商鞅被贵族陷害即死于此刑。三、斩首——清代“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后，首级悬挂于高杆。四、腰斩——明代诗人高启，因作上梁文讽刺朝政，朱元璋下旨，将高腰斩于南京。五、剥皮——明洪武时开国功臣兰玉就受此刑。六、炮烙——明宣宗朱瞻基将他的叔父朱高煦用大铜缸扣住，四周用木炭燃烧，直到将铜缸熔化，人在里边连尸骨也无存了。七、烹煮——汉武帝时中大夫主父偃就是被烹煮而死。八、抽肠——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厉声惨叫，很快就气绝身亡。此刑是朱元璋的发明专利，他的大将军徐达攻破苏州城时，有三名被俘“参军”就是用此刑处死的。九、剖腹。十、射杀。十一、沉水。十二、绞杀。十三、鸩毒。十四、火焚。十五、钉颅。十六、活埋。十七、锯割。十八、饿死。十九、梳洗——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最终咽气。（以上所引均见《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包振远、马季凡编著）

鲁迅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体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165——166 页）



另一种“安乐死”

中国古代最早的逼供信，据钱锺书考证，它与“有罪推定”是有直接关系的。例如秦代宦官赵高诬陷李斯，棒打千余，斯不胜痛，乃自诬服。钱先生说按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诸吾国记载，盖始于此。钱先生又举《张耳陈余列传》，贯高不肯供张敖反，“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盖非尽人所能。《太平广记》卷 267《来俊臣》，记武则天召见狄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对：“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卷 268《酷吏》记来俊臣与其党造大枷凡十，各有名字，其四曰

“著即承”，其六曰“实同反”，其七曰：“反是实”。夫刑、定罪后之罚也；不钩距而迳用枷棒，是先以非刑问罪也，如《水浒》第53回，高廉审问柴进，谓“不打如何肯招”；又马知府审问李逵所谓“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只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蒙田亦云：“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酷吏辈岂尽昧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管锥编》第1册第333页）

封建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不当人。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人的发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意大利有一位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杰出的法学家贝卡里亚，他曾经严厉谴责封建社会酷刑和拷问制度，他提倡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改革；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应被认为是无罪的人，贝氏可谓世界法学史上“无罪推定”理论的鼻祖；他认为对于犯罪应当是预防而不是报复，残酷的刑罚达不到预防性的目的，准确及时的刑罚才是预防性的。这些主张对于反对封建野蛮、残酷的刑事制度，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他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发表，在欧洲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向封建裁判制度的宣战书。他把社会契约的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认为：人们为了享受自由才割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人们割让出的自由的总和，组成国家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包括刑罚权，并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基于这种理论，贝卡里亚主张：1、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刑罚。颁布法律的权力知属于立法者，即属于根据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代表。2、法官的职权只是按照法律进行审判，不得对法律进行解释。3、只有法律规定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并应规定出从最轻到最重的罪行阶梯。4、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准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而不能以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罪孽的轻重作为标准。5、刑罚与犯罪应相适应，以阻止人们犯更严重的罪行。6、犯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怎样，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7、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犯罪人以后不再犯罪，并儆戒其他人不敢犯罪；因此刑罚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影响应是最强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身体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8、为了预防犯罪，应当采用比酷刑更为有效的温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罚。9、法律应当写得清晰明了，使每个人都能了解。贝卡里亚阐述的最终结论是：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它就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要的，是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适应的、并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他对刑讯逼供、秘密审讯，地方官腐败，以及野蛮和可耻的酷刑，都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强调刑罚制度的目的应以达到安全和有秩序的适当目标为限，超过了这一点，就成为暴政；刑事审判的效力主要是依赖于判罪的确定性，而不是依赖于其残酷性。

人道主义是全人类的先进文化遗产，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把人道主义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不仅仅是幼稚，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难道我们要继承江青极力推崇的所谓法家女英雄吕后处死戚夫人那样搞“人彘”（先砍断戚夫人的四肢，将她眼珠挖去，又用一种药熏耳致聋，给她饮以喑药，哑不能言，然后抛在厕所中，称之为“人彘”）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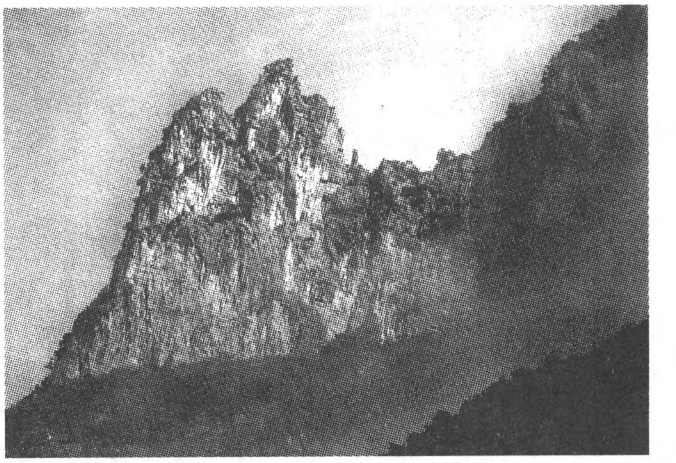
不论国际上有多少国家废除了死刑，我认为今日之中国，死刑是绝对必需的。当前，在腐败的路上昂首阔步得意洋洋越走越远而又尚未败露的那些腐败分子们，你们如果对成克杰、马向东之死表示羡慕，那就悉听尊便吧。

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不借鉴国外的反封建优秀的法制文化遗产，仅用中国封建的法制文化遗产来反封建，只能越反越封建。“文革”中“四人帮”的专政，就是封建加法西斯，他们砸烂“公、检、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连元帅、国家主席皆不可幸免，更不论对张志新割喉管了。死于“四人帮”酷刑下的志士仁人，不计其数。这正是独裁者无法无天，无理、无能和心虚的表现。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宜昌小峰悬棺

● 李华章



神女峰一带是悬棺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小峰，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那山村雄鸡报晓的引吭高唱，一声又一声此起彼伏，把我从吊脚楼的梦中惊醒，思绪万缕。我想起孩童时代在雄鸡高唱声中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天真；我回忆青春岁月在雄鸡高唱声中参加秋收的喜悦……

吊脚楼窗下的小峰河，弯弯曲曲，淙淙潺潺，腾着细浪，波光粼粼，且歌且舞。我真喜欢这支民歌风的晨曲。

隔江相望，“情人泉风景区”亮丽眼前。推开窗叶，窗衔巍巍棺木崖，“悬棺风景区”由此得名。放眼四周，高山环抱，云缠雾绕。此时此刻，我萦怀着“四面云山绕梦思”的心境。

小峰悬棺是战国时留存的文物。大清早，我们就登着三四百级的石阶，穿过长长的横空石缝走廊，兴致勃勃地来到一具悬棺前。眼前的这具悬棺用玻璃罩住，棺材是独木挖成的，依稀不朽的完整，尸骨已经腐化粉碎。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近距离地看着古悬棺。过去在大、小三峡只能远远地仰视那悬棺，虽然也产生过如梦如幻的幽思，但没有这么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真切。考古学家认定，它已有2300年那么久远了。瞬间，我怵目惊心，真个儿是“千秋风雨动心魄”。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葬俗，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较普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十几个省区，上下延续几千年，一直被视为“千古之谜”。可是，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论证，这“千古之谜”正在逐渐地被破解。比方，已发现悬棺葬的形式有多种：有的把棺材置于悬崖上的洞内；有的在悬崖上横开石缝，把棺材横放其上；有的在峭壁上寻找树蔸或凿石孔栽桩，把棺材悬搁在外；有的选择悬崖上的大岩洞，将多具棺材堆放在一处，等等。从已发现的棺材样式来看，既有船形的，又有长方形的；既有独木挖成的，又有用厚木板合成的。大凡悬棺都葬在临河的悬崖壁上，一般与水面相距百米以上。比起十几20年前的农村土葬，出殡抬棺材的丧夫不是8人就是12人。想想如此沉重的棺材，古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它放置在悬崖上去的呢？这仍是一个难以完全破解的“千古之谜”。

宜昌小峰的悬棺多而集中，实属罕见。站在河边，人眼可以望见的悬棺多达20多副，那么望不见的还有几多呢？1992年，小峰乡政府决定开发小峰悬棺崖，由我牵头。在顺着石缝横空开辟岩缝长廊时，被震荡摔碎的悬棺就有二副；沿着石阶登上悬崖，在一个洞里还有13副。我们把这里开发成悬棺文物风景区是名符其实的。因为交通方便，距宜昌市仅20多公里，中外游客年均达10万人次。

沿着石阶返回，山脚下河滩边，呈现一大片开阔的草坪，约8万平方米。每逢春夏季，绿草茵茵，绿意盎然。沿河的长堤，蜿蜒坚固，堤边杨柳，成行成带，清风吹拂，风摆杨柳，好似一排排靓女在河边洗着披肩长发，倒映水中，如诗如画。夏秋时节，清波碧潭可以洗澡、游泳、划船，让游客尽享大自然之美，其乐融融，雅兴浓浓……

沿河的吊脚楼，一座一座的独立着，外观古朴，原始地道，木楼之内，精巧雅致。我们憩宿楼中，可尽领略土家风韵，如入仙境。难怪国家旅游局刘毅局长1995年到此，欣然题词：“人间不见，冥府高悬，游人仰望，齐赞祖先，”当地人也自豪地赞叹：三峡天下壮，夷陵甲三峡。小峰非小，它将凭着古代悬棺文物和现代秀美风光，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责任编辑 王 云）

本期： 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审校 赵友慈

炎黄春秋杂志社迁址启事

敬告读者、作者：本社自 6 月 1 日起迁入新址

为改善本社办刊条件、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便于与作者、读者的联系，本社定于自 6 月 1 日起迁至新址办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政编码：100045

联系电话：社办公室 68532569

编辑部 68534879

发行部 68532048

乘公交车 13、21、37、65、68 路三里河东口下车西行 50 米路北，西华饭店院内北楼西门二层

炎 黄 春 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您若错过了邮局 2002 年下半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也可以单期零购，不另收邮寄费。

《炎黄春秋》每月 4 日出版，大 16 开本，内文 80 页，60 克双胶纸；彩封，157 克铜版纸。每期售价 4.80 元人民币。

2002/6 总第123期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中国拓扑学派”的数学泰斗江泽涵

头箸战犯大法学家王世杰

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

巴金的爱情与婚姻

酷吏与酷刑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ISSN 1003-1170
06>
9 771003 117002